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 和集中营里

索福克里·辽兹利
雅維爾·馬里奧著

(内部发行)

00016

目 录

代序言.....	1
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特殊机关.....	4
监狱、流放和杀害是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方法.....	5
八千多名门的内哥罗共产党员被关进集中营.....	8
铁托是怎样消灭在苏联生活过的共产党员的.....	10
军队里恐怖的清洗和消灭党员军官及爱国主义者.....	17
五千名关在狱中的军官.....	20
下列军官被判处死刑.....	24
在铁托私人卫队中的逮捕.....	25
一万二千名军官退居预备役.....	26
哥里·奥托克——恐怖和死亡!	27
奸细活动——铁托集团的主要工具.....	29
通往地狱的道路.....	31
请看臭名远扬的“排队”.....	32
修正主义者给纳粹分子的刑罚加添了什么新东西.....	36
犯人被分成三类：积极分子、消极分子和匪徒.....	38
折磨“匪徒”的刑讯.....	39
犯人不穿衣服，饿着肚子在雪天和雨天工作.....	40
还要受许多多刑罚.....	43
对那些不愿当变节分子的犯人实行抵制.....	44
犯人在判刑后被关进集中营，但他的案子到此并没有 结束.....	45
审问人员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培养特务.....	47

納粹秘密警察局集中營的經驗.....	48
犯人怎样受侮辱.....	49
“P—101”特种集中营或死亡坑	51
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	54
一年期內的深夜审訊.....	55
要想出监狱，必須燒毀一切桥梁.....	57
对被监禁共产党人家屬的迫害.....	60
国家保安局竭力破坏犯人的家庭，并使他們的家屬 腐化堕落.....	62

代序言

最近，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者除加强政治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帮助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外，还进行着广泛的蛊惑宣传，以便装出姿态，似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民主、法制、制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已经在那里确立起来了。

但是，尽管铁托集团千方百计向社会舆论隐瞒早已在南斯拉夫盛行的野蛮恐怖手段，它仍然不能完全掩盖住自己的地狱。逮捕、监禁、流放、杀害和迫害的规模是如此巨大，甚至修正主义制度的重要人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是缩小了范围的）存在着反革命恐怖。例如，在1960年3月30日内务国务秘书斯维齐斯拉夫·斯捷凡诺维奇给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议会的报告中就顺便提到：“普通法庭（不包括国家保安局的机关直接判处的徒刑——作者注）就对进行敌对活动的3 454人判处了徒刑，这与去年比较，增加数微不足道。1959年有3 004人越过了国境线”，即使这些毫不符合实际数目的材料也足以说明，在南斯拉夫是以何等巨大的规模在继续进行着对共产党人和真正爱国者的镇压。

南斯拉夫的报刊写道，在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公布后被关进监狱的数以万计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被释放了。不知道这有多大真实性。但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玩弄的大诡计，它不仅为了消除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警惕性，而且为了暴露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因为反对派在这些情况下可能认为，修正主义领导已经恢复名誉了。事实表明，一个时期过去后（这一时期再一次证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无可

救药的，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离开叛卖南斯拉夫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利益的道路）贝尔格莱德的头目們重新开始逮捕从监狱里釋放出来的共产党人，重新在达尔馬提亚的哥里·奧托克，旧格腊迪什卡和别的地方开办集中营。由此可见，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这次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从而制定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法典并宣布向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进行无原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性的斗争）恐怖手段不仅恢复了，而且采取着巨大的規模。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当铁托制度的假面具被完全揭穿后，他不再需要散布应酬話并宣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了。例如，在1958年底，早先从监狱里釋放出来的人重新又被关进了监狱，其中有門的內哥罗的米沙·謝尔丹諾維奇和1948年曾在监狱里的塞尔維亞恰恰克州康涅維奇村的康斯坦丁諾維奇·德拉甘上校。1957年初，南斯拉夫頒布了“关于行政惩罚法令”，按照这个法令，人們即使仅仅有嫌疑也可受到处分。依据这个法令，被告可以被判处2年徒刑至无期徒刑。实行这一措施首先是为了把那些最近剛从监狱里釋放出来的共产党人重新监禁起来，因为对于这些共产党人不能提出新的訴訟。白拉什涅維奇·德拉甘就是这样被监禁起来的，他在1956年从哥里·奧托克被釋放出来，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又重新被关到那里。前軍事科学院院长，西班牙國內战争的参加者魯鮑米尔·伏西奇教授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监狱里关了六年後，他在1958年被置于警察的監視之下，然后受到流放。在扎格勒布曾逮捕了許多大学生，因为他們上街示威，要求改善伙食和居住条件，降低食堂食品的昂贵价格等等。特別是那些不管怎样也反对第七次代表大会提綱的人們，很多都被逮捕了。

最近国家保安局机关获得了从来未有过的巨大权限。内务国务秘书发給自己的特务特殊证件，其中規定：“这一证件的持有者有权逮捕或釋放以及运用武器反对違抗者”。

很难描述現今南斯拉夫的监狱里政治犯所遭到的种种折磨。

甚至描写过地獄的但丁·阿利吉里的想像同南斯拉夫集中營里的現實比較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最近我們同一些南斯拉夫的政治流亡者（他們在遭到殘酷的折磨后逃出了铁托制度的監獄和集中營）談過話。我們下面引來介紹給讀者的他們的敘述是如此惊人，人們听了不能不感到忿怒……在這些敘述中沒有任何夸大的東西。其中只包含对于隱藏在鐵絲網后的駭人听聞的集中營的普通的如實的描述。這些集中營的基本原則是“對待敵人沒有法律可言”。這一原則類似但丁的地獄的題句，在這地獄的門口寫着：“進到這裡的人把一切希望都拋棄吧”。在集中營里真是暗無天日，那裡實行的是深山密林里的野獸法律，按其狠毒、粗暴和殘酷性來說，甚至超過可憎記憶中的納粹集中營。

下面所描述的在鐵托監獄中共產黨人的痛苦表明，新近關在哥里一奧托克集中營里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和愛國者遭受到些什么。他們暴露了貝爾格萊德修正主義的真正面目，并表明，貝爾格萊德修正主義制度是建立在南斯拉夫人民的鮮血和白骨上的，是建立在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和平而賜給修正主义者的金元的基础上的。

為了夸耀自己对于成千上万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和愛國者的殘忍和野蠻行為，鐵托分子毫无羞耻地吹噓并声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表現出“革命的能耐”、“思想的坚定性”和“对于現實的社会主义巨大內在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事实上，他們所需要的以及他們真正見長的，仅仅是警察的能耐，对于罪恶行为和犯罪的頑固，以及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无限忠誠。他們每杀害或折磨一个共產黨員，以及写出任何所謂的理論著作，美帝国主义就賞給他們以美元支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长篇大論地讲馬克思主義、社会主义，还有些人从理論上論述馬克思主義；但是南斯拉夫生活中的事實和事情的发展清楚地表明，这里有的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而是匪徒和拦路截击的强盜。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国家会像铁托的修正主义国家那样显示和夸耀在迫害和消灭共产党人中取得的这种成就。然而，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吧。

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特殊机关

在同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或者同被国家保安局（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工作人员称之为“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斗争中，铁托修正主义集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手段，并把它们和最残酷、最野蛮的刑讯和难以置信的恶意宣传和虚伪结合在一起。总之他们追求的唯一目的是：在肉体上消灭并在思想上摧毁反对现制度的共产党人。

在铁托集团叛变南斯拉夫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实被揭露以后，铁托集团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是随时间以及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的思想政治修养程度而各不相同的。例如，对于老共产党员、民族解放运动的优秀干部以及高级的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采取了威胁、监禁、挑拨离间等等办法，以便迫使他们公开声明同意铁托的路线。而对于中级和下层工作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把他们关进监狱，因为他们组成党员群众的绝大部分，于是采取了开除出党、派到遥远地区以及分配较低的职务等办法。在那里他们经常受到国家保安局的压迫，国家保安局威胁他们，要他们不仅放弃共产主义立场，而且成为国家保安局机关的特务和奸细。

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情况的决议公布后，始终忠实于铁托集团的国家保安局仔细地拟订了消灭南斯拉夫革命反对派的详细计划。为此目的建立了所谓“反对共产党情报局斗争总部”，由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亲自领导，总部的成员

有現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國內务国务秘书斯維齐斯拉夫·斯捷凡諾維奇，前駐苏联大使維爾科·米丘諾維奇，駐匈牙利大使約伏·卡巴契奇，伏約·比利亚諾維奇，前南斯拉夫駐波兰大使米列·米洛托維奇和南斯拉夫军队中特务机关的头子艾夫托·沙契奇。在拟定刑訊共产党人一国际主义者的方法时这一臭名昭彰的总部采用了希特勒的蓋世太保的經驗。为此目的首先利用了作为战俘留在南斯拉夫的蓋世太保的軍官。同时利用了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者关于他們在納粹和烏斯塔什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受到的刑訊的叙述。此外还利用了希腊保皇党法西斯分子对于爱琴海荒涼的岛屿上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的刑訊的經驗。国家保安局还向精神病医生征求意见，以便弄清楚人們心理的坚强性的限度。一切可以用来研究刑訊人的資料都收集来加以仔細研究。此外，“反共产党情报局分子斗争总部”搜罗了大量过去曾为蓋世太保和烏斯塔什服务过的人物，以及在监狱里服刑时受到短期訓練的其他刑事犯。然后，把他們派到聚集着共产党人的集中营里，假装是被判罪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拥护者。他們的任务是在囚犯中进行分裂活动和挑撥离間。

逐渐地整个国家机构、警察、法庭都准备好了实行一个唯一的目的——同真正的共产党人斗争，以达到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沙文主义組織，这个組織后来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命名。

监狱、流放和杀害是消灭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方法

1948年7月剛举行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立即开始大規模监禁和迫害共产党人。在此以前铁托集团因为害怕

党员和南斯拉夫人民，采取了非常狡黠和毒辣的政策。为了赢得时间和完成同共产党人斗争的准备工作，铁托和他的党羽起先通过修正主义的蛊惑宣传造成一种幻想，似乎铁托集团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只是“一般的誤会”，这些誤会一定会消除，一切“都将得到調整”。例如，在南斯拉夫很長期間內沒有人公开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托采取了似乎是保卫它不受“誣蔑”的立場。铁托的首領們在自己的言論中声明，他們拥护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那时甚至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加速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使党轉向公开地位等等。凡是可能揭露铁托分子同帝国主义合作的一切，都非常仔細地隐藏起来。例如，有一段时期，铁托分子公开拒絕接受帝国主义提供給他們的武器。

铁托通过这种政策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造成了錯誤的幻想，欺騙了党员群众并准备好了对共产党员进行正面的打击。預先經過仔細准备好的为通过叛卖性的托洛茨基修正主义路綫而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在同一時間开始大規模的恐怖手段。作为这一恐怖手段的牺牲者，成千上万个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南斯拉夫人民的忠实儿子倒下了。首先被抛进监狱的是老党员，这些是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参加者，曾在苏联呆过的共产党员，其次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南斯拉夫战士，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的老干部和其他人。从 1948 年起到 1952 年止，有 20 万以上的党员被开除出党，占党员总数的一半。国家保安局对于被开除的人施加了巨大的精神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压力，以便迫使他們最終地放棄自己的信仰并归附铁托集团。对待他們就像对待次等公民一样，他們沒有权利，处在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并經常遭到逮捕的威胁。

大家知道，还在共产党情报局決議公布之前，铁托就采取了严厉措施反对一切敢于批評他的反馬克思主乂、反苏路綫——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路綫的人。例如，他从党内开

除并逮捕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的两位委员——赫布朗、朱约维奇。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后立即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了鲍若·鲁莫维奇，巴纳·安得列也夫，拉达万·佐哥维奇，杜什科·贝尔基奇，拉德·瑞基奇，萨伏·兹拉奇茨，布拉哥也·涅什科维奇，除了拉达万·佐哥维奇，巴纳·安得列也夫，布拉哥也·涅什科维奇和斯列丁·朱约维奇在悔过书上签名后被释放出狱外，其他人全体都被关进监狱，然后送到哥里·奥托克的集中营里并在那里呆了漫长的岁月。

还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前，许多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就已怀疑铁托的政策，他的民族沙文主义，叛变和狂妄自大已经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决议毫无掩饰地向南斯拉夫人民揭露了使它们受到损害的悲剧。因此当时许多高级的党和国家干部起来反对铁托及其追随者的政策。但是铁托通过迫害和恐怖手段迫使他们投降，摧毁了他们。例如，正如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所叙述的那样，当格勒策哥维纳和波斯尼亚的国家保安局的大部分机关表示拥护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并拒绝逮捕共产党人时，维尔科·米丘诺维奇（他当时是兰科维奇的副手）就被派到那里。他把国家保安局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手枪放在桌上，简短地问他们：“或者你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并完成交给你的任务，或者请你吃一颗子弹”。凡是不同意的人立即予以逮捕。

铁托恐怖的浪潮也清洗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和部长。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副部长被开出党并关进监狱，如：米兰·卡拉法蒂奇，奥勃林·布拉哥也维奇，伏约·谢尔晋蒂奇，查斯拉夫·波若维奇，马克西姆·果隆诺维奇等等。

八千多名門的內哥羅 共產黨員被關進集中營

在門的內哥羅，以南斯拉夫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鮑若·魯莫維奇為首的政府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几乎全體被關進監獄。整個政府和中央委員會中只有布拉若·約萬諾維奇和其他兩三個部長轉向鐵托。在臭名昭彰的哥里·奧托克集中營（我們在下面將要講到它）里監禁並遭到刑訊的有門的內哥羅政府的 22 位部長和他們的副手。除了鮑若·魯莫維奇，送到哥里·奧托克的還有下列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和門的內哥羅政府的部長：武科·特姆施奇，尼科·波維奇，布拉若·波羅維尼奇，拉奇伏也·武基契維奇，等等。在門的內哥羅對鐵托的反蘇政策表現了群眾性的反抗，而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以至國家保安局機關只得逮捕在戰時和戰後入黨的全部黨員。如尼克希奇，蒂瓦利，達尼洛夫格萊德和貝蘭納這些州的州委和地委的全體成員都被關進監獄。鐵托分子逮捕了各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委派別人來代替他們，然而幾個月之後，他們逮捕了由他們重新任命的委員會成員並再一次委派新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而這些人同以前的一樣，在哥里·奧托克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根據某些資料，僅僅在哥里·奧托克就有 8 000 名以上門的內哥羅共產黨員，在其他監獄里他們的人數還要多。

由於這種恐怖手段，在 1949 年以書記伊里亞·布拉托維奇為首的貝洛一波里州黨委會全部都上了山，並號召人民用武裝抵抗鐵托集團的恐怖手段和叛變。因為害怕武裝起義擴展到整個門的內哥羅，國家保安局同起義者開始談判，只要他們投降，就保證他們不受侵犯並得到自由。輕信的人們相信了國家保安局人員的

話，回到了城里，但在那里立即被国家保安局的人包围起来并就地枪决。

企图逃跑的人也被枪杀了。有些共产党员是由当时內哥罗的內务部长薩伏·約克西莫維奇亲自杀死的。米尔科·什捷潘諾維奇上校，米腊舍維奇少校，伊里亚·鮑若維奇上尉和其他許多人就是这样被杀害的。类似当时在整个內哥罗流行的恐怖手段是史无前例的。

只要国家保安局机关知道某人送食物給共产党人或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这人就要受到迫害，枪杀在自己家門口或判处十年到二十年徒刑。被逮捕或被消灭的共产党人以前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由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切特尼克(旧南斯拉夫军队的残余——譯者注)和其他同占领者合作过的人来接替，他們想尽一切办法来协助铁托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

在赫尔瓦茨卡相当部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党和国家的高级工作人員被关进监狱。他們的人数很多，我們只指出杜什科·贝尔基奇，拉德·瑞基奇，察尼奇·奥巴齐奇，安德台·齐諾丁，尼科里奇博士，尼諾·卢普契奇，維也科·斯莫梁宁，米兰·斯坦尼岑，施梅·巴列宁。在达尔馬提亚的錫尼州——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之一——所有佩带“紀念”奖章(1941年)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在果尔斯克一科托尔和霍尔瓦茨卡河沿岸地带几乎全体党员都被逮捕。在伊斯特尔，省委会全部被捕。相当部分州党委和大部分党员被关进监狱或被开除出党。在斯洛文尼亚，为了回答恐怖手段和逮捕，一部分共产党員上了山。在同国家保安局机关或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之后他們之中有的牺牲了或被抓住，其余的逃跑了。

在波斯尼亚和格爾策哥維納逮捕了政府的許多成員，其中有奧勃林·斯达洛維奇，佩科·巴比奇，伏約·卢伊奇，科斯塔·格魯巴契奇，契杜·米約維奇等等。薩腊耶沃省委和各州委的許多委员和书记，以及几乎全部共和国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員都被逮捕。

在塞尔維亞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在洛夫乞納開除了 83 個黨員，其中許多人被送到哥里·奧托克。

在 1948 至 1952 年期間關進監獄的將近有 5 000 名軍官，其中有 5 位將軍，30 多位上校，他們主要是旅、師、軍、集團軍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大量被捕和被監禁的主要是在蘇聯學校畢業的軍官。只要某个軍官說一句他不願為反對蘇聯而戰，他就立刻被捕，受到刑訊，並判處 10 年到 20 年徒刑。以法院院長米爾柯·科爾吉奇將軍（他後來在獄中遇害）為首的最高法院成員，以及以韋爾科·日日奇為首的不願對共產黨人—國際主義者進行審判和定罪的總檢察院全體成員都被逮捕。被告不承認贊同共產黨情報局決議是犯罪行為，而認為完全是黨的內部事務。

鐵托是怎樣滅絕在蘇聯 生活過的共產黨員的

鐵托和蘭科維奇首先攻擊那些在蘇聯生活過多年的共產黨員，其中也包括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參加者。第一批被投入監獄的有下面一些共產黨員：

尼古拉·考瓦切維奇——南共最老的黨員之一，還在十月革命前作為戰俘住在俄國時就參加了工人運動。尼古拉·考瓦切維奇非常積極地參加了十月革命。後來回到南斯拉夫，被選為過去的南斯拉夫議會中的共產黨代表。以後被迫流亡到蘇聯，用丘德諾夫斯基的假名在聯共（布）黨內工作了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考瓦切維奇被關在法國的集中營裡，戰爭快結束時參加了法國的抵抗運動。戰爭結束後去蘇聯與家人會見，然後回到南斯拉夫。因為情報局決議的關係被捕入獄，雖然他並未表示支持這一決議，仍然被判處兩年所謂“社會公益勞動”，而實際上受了六年的严厉

监禁。

弗拉基拉夫·澤爾亞維奇——老联共(布)党员。用阿加貝克夫的假名，作为中央委员会粮食收购全权代表在乌克兰工作过。他也是十月革命的参加者。他认识铁托时铁托是奥地利军队的一名上士。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两人都在俄国成了战俘。在这期间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是，澤爾亞維奇是自愿向俄国军队投降的，而铁托是作为效忠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打到最后一颗子弹的上士被俘的。

維也柯斯洛夫·斯莫梁——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南共老党员，“纪念”章(1941年)的获得者。监禁前是南斯拉夫驻华沙使馆的商务专员。曾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监禁。

德列茲蒂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在苏联。作为南共老党员，为了用自己获得的经验来帮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需要回到南斯拉夫。德列茲蒂奇由于拥护苏联而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由于在狱中受的酷刑，使他在哥里·奥托克的全体犯人面前自杀了。

馬耶岑——十月革命的参加者，作为苏联的拥护者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上在哥里·奥托克住了多年。

留保米尔·克拉古也維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死于1948年，当时有许多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在监狱中遭受了六年极端的折磨。

伊利亚·伏約維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情报局决议后被监禁，在严厉监禁中服了五年徒刑。

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流亡苏联之前在南斯拉夫卡拉朱尔捷维奇监狱中呆了十年。在苏联获得了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表示拥护情报局决议，被国家保安局逮捕入狱，加以严刑拷打，然后被杀害。

安第耶·米利奇——老联共(布)党员，以军事顾问身分参加

了西班牙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苏联，曾被委派飞往南斯拉夫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不能久住，他和米塔·德斯波托维奇被迫重返苏联。安第耶·米利奇在严冬中冻坏双脚成了残废。战后回到南斯拉夫担任伤兵协会主席。他也受了多年的严厉监禁。

特拉伊科·米什考夫斯基——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多年的联共(布)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曾经在西班牙当过国际纵队的营长，老革命家。这位共产党员也遭到了与那些不願被套在铁托的反革命战車上的人同样的命运。被捕前是馬其頓共和国政府劳动部副部长。曾被判处两年的“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监禁。从监狱中出来后铁托继续贬低他，使这个老革命家遭受各种困苦，不給他工作和任何生活資料。斯庫普城的居民經常看到特拉伊科·米什考夫斯基沿街叫卖儿童玩具。

巴甫考維奇——也是老联共(布)党员，参加了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南斯拉夫，曾任塞尔維亚共和国部长助理，后任食品工业局局长。被多年关在哥里·奥托克，受到的严刑拷打使他站都站不起来。完全变成残廢，又沒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巴甫考維奇在出獄后两个月就死了。

馬尔科·斯巴希奇——还在大学生时代就从捷克斯洛伐克到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在那儿成了残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苏联。他也被铁托判处了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六年严厉监禁。

克里斯提納·庫索瓦茨——南共老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作为南斯拉夫的党代表在莫斯科工作多年。她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受到多年严厉监禁。

拉布德·庫索瓦茨医生——在莫斯科居住了多年。在南斯拉夫由于情报局決議被关进监狱，虽然他并未表示支持該決議。曾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上受了将近六年的严厉监禁。

弗朗尼奇——最老的南共和联共(布)党员之一。在铁托掌握

南共領導之前，曾是南共党核心党员之一。被投入狱，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是多年的严厉监禁。在哥里·奥托克集中营中铁托的警察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在完全残废的情况下被释放出狱。

安台·佐利奇——南共老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在苏联生活了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曾在中央国家保安局工作。在街上被捕，而其家属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了甚么事。

伊万·科尔达——南共老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了多年。被捕入狱，判处了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受了约六年的严厉监禁。

卡尔托夫策夫——毕业于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在联共(布)领导下做过党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和在苏联建立的部队一起回到南斯拉夫，战后是南军队中的军官。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然而受了多年监禁。出狱后在扎格勒布做泥瓦工。

穆斯塔法·贝吉奇——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在苏联居住多年并从事党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回到南斯拉夫，担任扎格勒布油脂厂厂长。国家保安局要他发表诬蔑苏联的声明，但他拒绝了，故此被关进监狱。国家保安局的特务传言说他死在监狱里了。

阿道尔夫·什图姆夫——教授，南共很老的党员。这个经过锻炼的老党员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那里从事把列宁全集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工作。同时担任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德文部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到被捕入狱前一直在贝尔格莱德高级党校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这类学校在南斯拉夫于1948年被当作无用之物而关闭。

什图姆夫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监禁。在健康状况极坏的情况下被释放出狱。由于苏南关于双重国籍的协定，他是共产党员中唯一有条件保持苏联国籍的人。

在1958年4月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因为同苏联驻贝尔格莱德使馆有联系，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南斯拉夫。但在动身前什图姆夫病倒了，被送往医院动手术后就死了。许多人认为什图姆夫的死大为可疑。

约有二百个朋友来给他送葬，同时也来了许多国家保安局的特务，负责侦察敢于给老共产党员来送葬的那些人。因为送葬的人数比兰科维奇的警察机关规定的多，所以送葬被看成是反对铁托的大示威。参加送葬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都被国家保安局的刽子手们传去审问。

季米特利·斯坦尼塞夫列维奇——南共的很老的党员。作为政治侨民在苏联居住过多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法国的抵抗运动。被捕入狱，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上受了多年的严厉监禁。

米塔·德斯波托维奇——曾多年生活在苏联，在南斯拉夫侨民中用的名字是鲍伊科夫。曾是苏联公民和联共(布)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轻工业部人事局局长。也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曾在哥里·奥托克“P-101”监狱服刑，因在悔过书上签字被释放。后来，据国家保安局特务说，他曾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自杀了。

培察尔斯基——前南共中央委员和联共(布)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实际受了多年的严厉监禁。

瑪利·普莱泽尔——法共老党员。作为政治侨民在苏联生活了多年。铁托也逮捕了她并在监狱中关了她很久。

约澤·朗察利奇——老党员，曾在苏联居住，后自愿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受伤。在国家保安局监狱中的审讯使他的健康急剧恶化。出狱后不能作任何工作，完全成了残废。

米尔科·马尔科维奇——老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

学和紅色教授养成所。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曾任上尉。他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受到很久的严厉监禁。

穆斯塔法·特尔鲍尼亞——南共老党员，苏联公民和联共(布)党员。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由于情报局决議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很长時間都受到严厉监禁。

維利姆——被判处几年的严厉监禁，由于刑訊而精神失常。

布拉納·馬爾科維奇——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作为政治侨民在苏联住过几年。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受到了長時間的严厉监禁。

維达克·阿森尼也維奇——南共和联共(布)的老党员——保卫斯大林格勒勋章获得者。在苏联时用的是假名薩列美亭。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却受到几年的严厉监禁。

西里瓦斯特·弗尔梁——南共老党员，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士，曾参加法国的抵抗运动，在法国受伤成残廢，因战功获“战争十字章”。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受到多年的严厉监禁。

在这份被铁托投入监狱和进行多年拷問的老共产党员名单中，常常提到“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和“受到严厉的监禁”。要了解这些字的全部意义，更确切些說，把这些公事上的措詞轉变成真实情况时，要求人們能够想像出史无前例的凶殘行为。在铁托的集中营里，在多年执行“社会公益劳动”的判决期間里遭受折磨的那些人向我們說明了，国家保安局的机关对待老共产党员們的折磨，严刑拷打，描繪出了难以想像的殘暴图景。遭到铁托和兰科維奇迫害的名单很长，这里只提出一部分人并簡短地叙述了一下經歷。現在，讓我們看一下这些人的遭遇和悲剧。

他們都是甚么样的人呢？他們的名字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經歷，但是他們有一个共同点：他們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女，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偉大的工人阶级事业，献身于世界青春——共

产主义的偉大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为了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人类的幸福，他們到处都在和同一个敌人斗争：在南斯拉夫——反对君主制大塞尔維亞資產階級，在俄国拿起武器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反对沙皇，在西班牙——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参加了抵抗运动的行列。他們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住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一方面，为苏维埃人民的偉大建設事业做出了平凡的貢献，另一方面，他們在那里受到联共(布)党的教育，得到了中等或高等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获得了丰富的建設社会主义事业的經驗。而当他們祖国解放的那一天，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他們生活的理想中作出貢献，他們回到了祖国。他們愉快地回到了南斯拉夫，认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偉大理想开始实现了。但是他們的希望并沒有实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了南斯拉夫人民为之斗争的那些理想。兰科維奇的机关首先向老共产党员們开刀。这是因为他們大多都是职业革命家，有十月革命、联共(布)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偉大經歷。因为这样，他們就成了铁托实现其反革命計劃的巨大障碍。国家保安局用各种办法来摧毁这些人，强使他們同意叛变和进行誹謗。国家保安局机关对他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严刑拷打。举例看看他們是怎样把坚强的共产党員伊什特万·杜鮑什打成殘廢和害死的。

伊什特万·杜鮑什——南共和联共(布)的老党员和沃伊沃迪納的代表。

毕业于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在那儿用的名字是伊万諾夫，曾在高爾基市汽車工厂工作多年。铁托分子把他判了几年的严厉监禁，随后在监狱中把他打死了，像通常所作的一样，散布的消息說他死在獄中了。但在旧格腊迪什卡监狱中的所有犯人都知道这位老共产党员是怎么“死”的。兰科維奇的警察机关像要求其他老共产党员一样，要求杜鮑什承认自己是苏联的間諜，并在“悔过书”上签字。但杜鮑什拒絕放棄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理想，不願意走铁托和兰科維奇的叛变的道路。因此在审訊期間就对他实行严刑拷問。

判处了几年徒刑以后他被轉到旧格腊迪什卡监狱，在那里繼續拷問他，并在全体犯人面前恶毒地侮辱他。

用燒紅的铁棍燙他，捆起两脚倒吊起来直到失去知觉为止。但是最残酷的拷打也不能摧毁这个鋼铁般的布尔什維克。铁托分子决定利用变节分子来杀害他，同时用来恫吓其他犯人，因为在这些犯人眼中杜鮑什是坚决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活生生的榜样。为实现这一犯罪行为，旧格腊迪什卡监狱管理处答应釋放这些变节分子，因此后者就热心干起了卑鄙的勾当。起先他們让杜鮑什說斯大林是“叛徒”，当他回答說，不能把斯大林叫作社会主义的叛徒时，变节分子把他推倒在地上打得死去活来，直到他在变节分子脚下断了气为止。这还不够，这些罪犯又在他的血淋淋的尸体上狂跳，弄碎了他的肋骨，肩骨，弄烂了他的头，使最亲近的朋友都认不出他来。看，铁托分子对老共产党员的仇恨和残暴达到了甚么地步。而最伪善的是铁托分子企图在人民面前把这些卑鄙罪行說成是自然的死亡。許多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老共产党员像伊什特万·杜鮑什一样在铁托的刑房中英勇地牺牲了。

下面是新的一章，讓我們看看铁托是如何对待軍事干部、党员軍官和爱国主义者的。

军队里恐怖的清洗和消灭 党员軍官及爱国主义者

在苏联結束学业的相当一部分軍官和將軍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莫斯科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毕业，被铁托的劊子手杀害的將軍中，社会上只知道一个上将阿尔梭·約万諾維奇的情况，他曾任南斯拉夫军队參謀本部參謀长，大家都知道，在南共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企图偷越国境时被杀害。在他被杀害以后，有

下面一些和他一起毕业于伏罗希洛夫軍事学院的将校軍官被捕入獄。

布兰科·泡利亚納茨——中将，被判处十七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他被拷打和折磨成残廢，精神也失常了。

久里奇·莫奇罗——上校，战时是总參謀部防卫營營長，战后是铁托卫队队长。被判处十二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拉杜洛維奇·斯洛鮑頓——上校，也被判处十二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拉吉奇·斯拉夫科——中将，情报局決議发表后突然死亡。人們只能猜測其死因。

毕业于伏龙芝軍事学院的校尉軍官中，被捕和受审的有下面一些同志：

薩沃·斯塔諾也維奇——上校，由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功绩曾获“人民英雄”称号。被判十二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米尔柯·巴特利采維奇——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稚郭什·扎里奇——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杜欽諾夫·伊万——中校，曾参加西班牙內战。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达尼洛·朔洛維奇——上校，被判十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薩利赫·拉頓齐奇——中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久柯·比基茨基——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阿勃拉莫維奇·米兰——上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米尔科·什切巴諾維奇——上校，在获釋后被杀害。

波列克西奇·莫奇罗——上校，被判十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米洛什·馬諾伊洛維奇——上校，被判极刑，后来，铁托分子为了宣传目的把它改为无期徒刑，以便向人民說：“看吧，我們是多么人道的人，我們沒有杀死过一个情报局決議的同情者。”米洛什·曼諾罗也維奇确实未被枪杀，但在到圣格里哥里那島的集中营后立即被杀害了。在那里把他打死，把尸体弄烂，以致沒有一个亲人能认出他来。这种死也被铁托分子說成是自然死亡。

在伏龙芝軍事学院毕业的十七个上校和中校中有十一人被捕，被判长期徒刑及强迫劳动。

毕业于苏联其他軍事学校的軍官被捕的有：

馬依岑·杜山——上校，被判十六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伏卡吉諾維奇·伊利雅——中校，被判九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卡拉日奇·沃約——中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久拉雪維奇·沃約——中校，被判十四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捷米尔·鮑沃維那——中校，被判十六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伊利亚·卡列維奇——中校，被判九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科伊奇·魯鮑——少校，被判十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謝什里雅·戈伊科——上尉，被判八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莫达柯維奇·布兰科——上尉，被判数年徒刑。

伏歐謝維奇·米萊——上尉，被判八年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

原苏联軍事学校的学员**米萊·曹拉茨、斯拉夫柯·李察宁、瓦米吉·斯台凡、波波維奇·米兰、格奥尔基也夫斯基·馬那和格里克尼奇·基沃塔**也被判罪。

逮捕这些軍官清楚地說明了，铁托和兰科維奇不仅想清除那些老的党員干部，还想清除那些在苏联高等軍事学校受过教育，在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丰富的政治經驗的軍事干部。铁托分子把这些軍官判了重刑，想以此来恫吓大多数不願叛变的軍事

干部。到 1953 年底約有五千名黨員軍官被捕，這一事實本身清楚地說明了南斯拉夫軍隊中過去的情況和將要出現的情況。據估計，僅被捕的約五千名的軍官和將軍們就被判處徒刑共五萬年以上。

五千名關在獄中的軍官

上面我們說明了，鐵托是如何清算那些在蘇聯高等軍事學校畢業的高級軍官的。但是逮捕並不只限於這一些。被捕的約有 5 000 名軍事干部——各級軍官。稍微講一下南斯拉夫軍隊的高級干部。

南斯拉夫軍隊的領導干部絕大部分都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參加者，是工人、農民和人民知識分子的子弟。這是些信任蘇聯和對解放祖國的鬥爭有信心、為紅軍的榜樣所鼓舞的人們。對“俄羅斯母親”的傳統的愛在加強南共幹部的事業上也起了良好的作用，這在軍隊中也得到了反映。而南斯拉夫和蘇聯戰士為解放南斯拉夫這一共同的事業而獻出的鮮血，使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堅信，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們和蘇聯分開。

這些干部清楚地懂得，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鬥爭之所以取得勝利完全是紅軍勝利的結果。由於這個緣故，鐵托及其幫凶在共產黨情報局作出決議以後的一個短時期內仍不得不繼續說蘇聯和紅軍的好話。但是當偽善和欺騙的手法毫無所獲之後，就改用暴力了。第五次代表大會提出轉向消滅軍事干部。請看在南斯拉夫軍隊中是如何朝這方面準備的。在有約 200 名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五軍指揮部和指揮部直屬組織的代表會議上，政委沃約·科瓦切維奇將軍讓諾維茨·德亞諾維奇上尉表示態度，雖然後者並沒有要求發言，因為在這以前他已在自己的黨組織里表示過支持共產黨

情報局的決議。在科瓦切維奇將軍的逼迫下德亞諾維奇只是說，他同意決議，沒有什麼可補充的了。以後科瓦切維奇將軍便對德亞諾維奇上尉說：“你是一個敗類、下流的東西和叛徒”，並命令 KOC（軍事偵察機關）負責人朵曼·伏西奇中校立即逮捕德亞諾維奇。命令當場就執行了。德亞諾維奇上尉就在黨的會議上帶上手銬被押進了監獄。德亞諾維奇沒有被選為代表而被叫去開會這一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說明，逮捕他是事先準備好的，其目的是恫吓參加代表會議的其他人。在這種場合本來是沒有必要事先準備好手銬的。第二天，根據鐵托本人的命令德亞諾維奇被剝奪了軍階，並被送往哥里·奧托克的集中營，好幾年來一直遭到拷打。沃英·波波維奇將軍（以後是鐵托衛隊的政委）在準備第五次代表大會時期的行為也很說明問題。在尼什召開的第 3 軍區黨的會議上，他宣稱將槍決所有即使敢于說一個字反對鐵托的人。

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中還採用了撤消當選的黨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辦法。例如在代表會議前夕撤消了斯列多耶·烏羅舍維奇將軍、盧波·伏紹維奇教授和其他許多共產黨人的代表資格，因為鐵托分子不相信這些人在代表大會上會支持他們的叛變路線。盧波·伏紹維奇是老共產黨人，在階級敵人的監獄里他曾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而在民族解放鬥爭時期失去了三個兄弟。在撤消這些人的黨代表大會代表資格的同時，却把忠實於鐵托的人當作代表派往代表大會。由於實行這種路線，在人民國防部儘管有許多將軍和軍官，黨組織卻選舉了布基薩夫列維奇·雅萬嘉（約瑟夫·布羅茲現在的妻子）當代表，而當時在參加代表會議的人們中間誰也不認得她。

在軍隊中就是這樣準備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在其他組織中也是以類似的方法進行準備的。代表大會大肆攻擊共產黨人。軍隊中的逮捕浪潮是堅決無情的。我們手頭有很長的被捕軍官的名單，但是為了使讀者不致太累，我們只提出某些高級軍官的名字。

在被捕的 5 000 名軍官中有 5 名現役和 3 名預備役將軍。現

役將軍是：久科·米腊舍維奇少將，米尔柯·科尔吉奇少將，韦尔科·日日奇少將，布兰柯·泡利亚納茨中將和布兰柯·彼特里切維奇少將；預備役將軍是：拉德·吉基奇中將，杜施柯·布尔基奇中將和恰尼查·奥巴齐奇少將。斯拉夫柯·罗地奇將軍在可疑的情况下死亡，而斯列多耶·烏罗舍維奇將軍和拉多凡·伏卡諾維奇將軍被安排到次要的职位上去。

在 1948 年被捕的上校中有：弗拉基米尔·达普切維奇——南斯拉夫军队宣傳鼓动部部长；杜克朗·伏卡蒂奇——南斯拉夫军队坦克学校教官；薩伏·伏克切維奇——《人民軍报》社长；布拉哥也·科姆涅諾維奇——高等軍事学院后勤部主任；亚涅斯·耶澤謝克——駐羅馬武官；布拉尼施拉夫·安蒂奇——炮兵学校教員；米連柯·斯托亞科維奇——南斯拉夫军队軍事政治学校政委；波約·伊万諾維奇——第 3 軍区后勤司令官；魯波·尼基奇——南斯拉夫军队軍需部主任；米奧德拉克·洛吉奇——南斯拉夫空军軍司令部科长；米里亚·拉科維奇——南斯拉夫军队高級軍事法院审判員；拉德·米卢蒂諾維奇医生——某軍卫生部主任；阿历山大·巴巴洛伏斯基医生（职位不詳）；卢波·伏紹維奇——在政治部工作；米留金·达普切維奇——师长；米里伏也·格罗茲多尼奇——师长；諾瓦克·貝爾齊奇——第 5 軍參謀長。

1948 年被捕的中校中有：斯达諾也·布拉約維奇——南斯拉夫军队政治部鼓动科长；伏卡申·米利奇——南亚得里亚军区政委；采多·約万諾維奇——师政委；斯列騰·巴列維奇——师政委；拉基奇·布拉托維奇——师政委；潘多·西米奇——师政委；內納德·瓦西奇——波斯尼亚和黑賽哥維那国家保安局第一科科长；萊姆佐·杜腊諾維奇——波斯尼亚和黑賽哥維那人民保卫部的一个科长；斯多列·科瓦切維奇——一个科长；博若·伊凡諾維奇——黑山警察局长；克尔斯塔伊奇·維爾科——黑山警备司令；維爾科·托米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杜卡·波若維奇——机场負責人；伏約·久腊謝維奇——高等

軍事學院教員；沃英·亞涅維奇——師軍事檢察官；伊里亞·伏卡迪諾維奇——高等軍事學校教員；杜山·卓洛科維奇——人民保卫部司法科工作人員；弗拉多·拉基奇——最高軍事檢察院工作人員；托莫·安吉奇——第6軍軍事商業企業經理；內几柯·馬爾蒂諾維奇——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人民議會任職；貝塔爾·巴諾瓦策——塞爾維亞國家保安局工作人員；拉多万·伊利奇——南斯拉夫軍隊高級軍事法庭審判員；拉杜·麥德尼采——（職務不詳）；彼羅·布基薩夫列維奇——扎格拉布炮兵學校教員；阿歷山大·特諾菲莫夫——高等軍事學院教員；莫蒙契羅·哥洛維奇——師參謀長；伏可薩夫·鮑什科維奇——比也羅一波列區國家保安局主任；米爾可·鮑什科維奇——貝爾格萊德市衛戍部隊司令；塔巴科維奇·米蘭和喬治·日夫科維奇——師參謀長；維爾可·貝哥維奇——軍部的一個科長；巴施可·布班尼——（職務不詳）；久里奇·拉多米尔——塞爾維亞國家保安局工作人員；杜山·卓皮奇——團長；沃約·卡拉吉奇和米洛什·朱里奇——炮兵部隊指揮員；伏卡金·約萬諾維奇——工兵部隊指揮員；拉紹·伊格尼亞托維奇——炮兵旅長；布朗科·科瓦切維奇——團長；約佐·科瓦切維奇——（職務不詳）；采羅維奇·德拉甘——團長；拉伊可·古貝里尼奇——警衛團政委；鮑施可·庫里亞察——團長；米拉万·米拉諾維奇——通訊團團長；盧波·波羅維尼奇、拉多伊采·塞庫利奇和拉佐·波彼沃達——團長；沃英·策羅維奇——高等軍事學院教員；約瑟·拉加爾——師參謀長；維爾科·斯捷凡諾維奇——人民保卫部科長；久科·斯特羅斯基——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人民保卫部科長；伊里亞·卡列維奇——師參謀長；德拉基·約萬諾維奇——高等軍事學院教員；米哈伊羅·伏伊科維奇——人民代表；鮑格唐·熱爾科維奇和諾沃·朱基奇——（職務不詳）；托莫·扎里奇——第3軍區科長；德拉基·菲利波維奇——扎格拉布軍區政治部指導員等等，等等。

所有軍官都一無例外地被判處重刑。他們被判處5—20年的

严厉的徒刑和强迫劳动、无期徒刑和死刑。在判决书中无耻地指出，犯人之所以判处这种重刑和长期徒刑是为了使他們有足够的时间来反省自己的背叛行为。

下列軍官被判处死刑

米洛什·馬諾伊洛維奇上校，烏可·米利基奇少校，米列·日夫科維奇上尉，薩沃·斯托雅諾維奇中尉，布多·托米奇中尉，德拉哥斯拉夫·馬爾科維奇中尉，拉都列·姆爾基奇少校，弗拉多·塞庫羅維奇中尉，伊万·德菲安采夫斯基少校，斯坦科·策爾文科少尉，德拉哥·法邊納茲中尉，維利沙·馬爾科維奇上尉（只因为他在法庭上喊“斯大林万岁”），拉佐·拉佐夫斯基（战时曾被法西斯分子判处死刑），米兰·特爾鮑維奇上尉，久罗·姆連諾維奇上尉及其他許多人。

某些被判死刑的人后来被人民議会主席团专令赦免，以显示制度的人道。严厉地判处死刑，以及有时搞假枪决，其目的是增加犯人精神上的緊張，使军队中的动摇分子畏惧和屈服。犯人們一月又一月地长期等待对赦免的答复。

从军队中被捕人員的巨大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铁托集团所制造的那种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和恐怖，这是針對所有那些敢于批評或企图表示反对其政策的人的。

然而，尽管修正主义分子早就埋葬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們揚言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存在着党内民主。铁托的主要走狗——亚历山大·兰科維奇在南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重談其党内民主，按照他的說法，好像这是建立在从下面来的和从上面来的意見自由斗争的基础上的。

在铁托私人卫队中的逮捕

然而逮捕的浪潮并没有就此结束。铁托和兰科维奇逮捕了所有有一点点被疑为可能反对其修正主义政策的共产党人。逮捕也扩大到铁托的私人卫队，这个卫队的规模和实力比过去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卫队要大得多。在1948年该卫队由两个警卫师组成，每师有3个团和一个负责内宫的警卫团。此外，铁托还有一个由200人组成的军官连。在卫队中有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兵团和空兵团。卫队由铁托本人直接指挥，而人民保卫部和它毫无联系。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卫队各单位里是如何进行清洗的，这是南斯拉夫的流亡者对我们讲的。

特别军官警卫连政委拉伊科·古贝利尼奇中校由于表示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被判处8年徒刑；特别团政委鲍日维奇少校被判处14年徒刑；特别团团长米罗拉德·扬科维奇被撤职；特别营营长沃约·阿布腊莫维奇中校被捕，出狱以后解职养老；铁托的私人医生波若·波若维奇少将复员了；第一政治部少校德维奇被判处12年徒刑；卫队上尉米里奇·卡拉吉奇被判刑9年；卫队检察官久尔基奇·拉多米尔少校——4年；KOC（军队侦察机关）军官维多也·伊万诺维奇少校——14年；军官警卫连弗拉多·巴甫洛维奇上尉——10年徒刑；杜山·比基奇上尉仅仅因为他在党的会议上在回答是否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问题时说了一句：“我赞同俄国人”，被判处2年“社会公益劳动”，然而服了6年徒刑。安台·伏克曼少尉（军官警卫连）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伊万·卢什诺维奇少尉（军官警卫连）和其朋友伏克萨尼克一起被控准备谋刺铁托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警卫营营长库里利奇上尉企图逃跑，在边境被打死；西莫·萨沃维奇少校被开除出卫队；特别军官连涅德尔

科·吉雅伊奇上尉被开除出卫队，以后又被捕并被判处几年徒刑。

几乎所有在統帥部警卫营服役的軍人(当时約 500 人)都被监禁在獄中或被开除出卫队。铁托的副官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尼基采·皮尔拉副官，据国家保安局的消息，是自杀了；拉德·利斯塔諾維奇上校解职养老。战前入党的鮑什科·卓利奇少校，1941年以来就是铁托的副官，被判处死刑。以后改为无期徒刑。他被判刑只是因为在战争剛結束时毫无恶意地向苏联电影工作者談过铁托和丘吉尔第一次会面的情形。

铁托任命了新的、忠实于他个人的人来代替老副官，而不管他們过去如何。例如，前巴維尔·卡拉朱尔捷維奇王子的侍从宪兵米兰·杰杰尔成了他的第一副官。誰也不敢說他曾是个宪兵！例如米兰·第米奇中校就因为說过类似的話而被判处 12 年徒刑。

一万二千名軍官退居預備役

就这样，铁托及其帮凶在南斯拉夫军队中进行了清洗，赶走了最有战斗力的、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軍官。然而恐怖手段并沒有使効子手如願以偿。为了收买军队和鼓励其队伍中的升官思想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倾向，1948年以后铁托扩大了軍官的特权，提高他們的官阶，广泛分发勳章和大量封給“人民英雄”称号。这一称号也給予了某些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以胆小出名的軍官們。例如巴奈·糾基奇，他在和法西斯斗争中毫无战功可言，相反地却和共产党人进行了斗争。在战争結束 10 年以后，大量授予人民英雄的称号，广泛提級，給以奖賞，发給勳章和1941年紀念章，这都是1948年以后在军队中出現的严重状况的結果。但是，这在那些在战时确实表現为英勇战士的軍官中間起了反作用。

1948年以后铁托及其帮凶开始怀疑几乎所有参加过民族解放

戰爭的軍官，雖然在軍隊中留下的只是些已經聲明準備甚至和蘇軍作戰的軍官（鐵托分子把蘇軍說成是帝國主義的，彷彿它是南斯拉夫獨立的主要危險）。雖然軍官們作了類似的聲明，但是國家保安局並沒消除對他們的懷疑。把他們留在軍隊中仅仅是因为怕軍隊瓦解。

現在鐵托分子極其關心在軍事學校培養一批新的青年軍官，按照他們的看法，這些人是會忠實於鐵托的制度的。在這方面他們是做到了。用這種辦法訓練出大量軍官干部之後，鐵托分子便讓相當大的一批經歷過戰爭考驗的老干部復員或退職養老。從1948年到1955年有12 000名軍官轉入後備役，這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考慮，而不是像鐵托分子所竭力說成的那樣，是“社會集體對在戰爭中耗盡精力的人的关怀”。

哥里·奧托克——恐怖和死亡！

前面我們敘述了鐵托為清算老共產黨人和軍事干部而採取的手段。敘述了逮捕的情況，提出了人名，介紹了他們被判处“社會公益勞動”和長期徒刑的原因。但是這些人到哪兒去服刑呢？

現在我們寫到鐵托制度中最黑暗的一頁，或者說，那些能揭示南斯拉夫特殊社会主义的实质的东西。我們來打開監獄和殺人的集中營的一頁。毫無疑問，為了描繪這些，需要有作家的手筆。我們現在對我們聽到的一切的描述，和實際情況比起來將是非常貧乏无力的。我們將列舉事實，並且只舉事實。顯然，如果有一天有人來描述這些集中營、正是描述這些駭人聽聞的集中營中的一個可以稱之為地獄而無愧的集中營的話，那麼這種描述可能會是我們時代最震撼人心的描述之一。

鐵托和蘭科維奇幼稚地爭辯說，因共產黨情報局決議而判處

共产党人服“社会公益劳动”并不是判处徒刑，而只是輕微的人道的行政措施，目的在于改造人。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許多公民形式上被判处两年的“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上却服长期的、严厉的监禁，或被消灭掉。铁托的法律規定，犯人只有在证明自己已改好时，才能釋放，換句話說，这就是只有他成了社会主义的叛徒才能被釋放。不屈服的共产党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铁托分子同时还辯白說，通过行政程序判刑的共产党人，在偵訊拘留之后沒有送往监狱和集中营，說軍人沒有被判处严厉监禁和强迫劳动。铁托分子过去和現在都反駁說，哥里·奧托克既不是监狱，也不是集中营，說南斯拉夫根本就沒有集中营。铁托分子同欺騙是分不开的，他們就是欺騙的化身。铁托分子，这就是恐怖、挑衅和欺騙。一方面，他們說，他們修正主义的国家是最人道的，而实际上他們建立了世界上最专制的警察国家之一。其次，他們宣傳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在恢复资本主义；他們大談民族自由，其实这是在公然嘲弄被他們奴役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他們建立許多监狱和集中营，但不用原来的名称，却称之为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是妥卜切德尔的众神在改造垂死的母羊。然而哥里·奧托克，这不是布里奥尼，正像但丁的地獄不是天堂一样。我們所遇到的从哥里·奧托克地獄中得救的人們訴說了对犯人所施行的駭人听聞的折磨，只有作恶成性的匪徒才能建立类似的集中营。

当說到哥里·奧托克时，我們指的是两个集中营：一个在哥里·奧托克，另一个在圣格里哥里耶，这是亚得里亚海上相隔3英里的两个小島。

在哥里·奧托克集中了大批因共产党情报局決議而被判刑的共产党人。这个小島面积約12平方公里。其四周有卫兵的汽艇守卫。每只汽艇都和这个荒島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之无法看清島上的情景。这个島是如此的干燥，只有在石头縫中才能勉强找到一点儿草。全島都修筑了工事，沿海岸架設了許多机关枪，守卫着各主要通道。島上所有的营棚都用带刺的铁絲网圍着，在崗楼上还

有哨兵守望，这好像是仿照納粹的集中营建造的，或者像在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关闭西班牙战士的法国集中营一样。逃出这个地狱的人们说，在这些集中营之间的唯一差别是：如果说很多犯人能从法国集中营中逃出的话，那么铁托的集中营却建造得如此坚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逃出这个小岛。例如，1941年就加入了对占领者的斗争的维尔科·姆尔达科维奇曾经逃到了拉布岛，但在那儿又被捉住并重新送回集中营。把他抛进了地下室，进行拷打，然后杀害了。在脖子上捆上石头后把尸体扔在海里，但是后来浪潮把尸体冲到岛上来了。犯人们认出是他并把他掩埋了。必须指出，掩埋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唯一的一次。

尽管这是道地的集中营，然而敢于说自己是在集中营中的犯人都遭受最严重的惩罚，因为他的说法和铁托—兰科维奇所定的官方名称不符，他们把这种大规模的集中营叫做：“劳动所”，或“大理石”工厂。而实际上它是道地的折磨共产党人的场所。

在哥里·奥托克和圣格里哥里耶岛上有一个集中营：3个男的，1个女的。4个里面有一个叫做“P-101”的，它具有最森严的监狱的一切特点，而不像个集中营。其中监禁的主要是一些南共的老干部和一些参加过西班牙斗争的人。其中还有大部分在苏联呆过的老共产党人。

上述各集中营的内部制度是各色各样的。在这些集中营里都把让新来的犯人“通过排队”当作教育措施。兰科维奇的刽子手们用以迎接新犯人的“排队”是怎么回事呢？

奸细活动——铁托集团 的主要工具

在谈“排队”以前，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讲一讲。

当国家保安局看到某一共产党人坚持工人运动的路线，当它肯定借助于狐狸的狡猾伎俩不能使他加入反苏运动，这时候它就把他逮捕起来。逮捕（在逮捕时经常是非常粗暴的）之后，被捕者立即被隔离起来。

为了使犯人屈服和迫使他们承认国家保安局机关所需要的东西，在审前拘留期间使用一切手段，如说服，施加压力，饿肚子，毒打以及最凶狠恶毒的拷问。例如经常施行鼻孔灌水，或所谓“西班牙式游泳”，通电，在性器官上缚上砖头等等。如果国家保安局人员用这些手段不能使犯人屈服的话，那时就派奸细到他的牢房里去，其任务是和他接近，逐渐地向他打听国家保安局所需要的一切。数月、甚至数年处于隔离状态的犯人不能坚持缄默，而当他一开口讲话，就立即落入从变节的犯人中挑选出来的奸细的圈套。通常奸细工作都是由被捕者的熟人或朋友来进行的。

有时把两个很熟的而又都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的被捕者关在一个房间，在房子里装上偷听器或磁性录音机，记下他们之间的谈话。然而国家保安局并不满足于把“罪行”强加给犯人。这仅仅是第一步。国家保安局首先特别追求的是让犯人放弃自己的信念，千方百计地力图在道义上和精神上使之屈服，使他们成为奸细特务，然后利用他们去改造其他犯人，或出狱后去干间谍工作。

铁托集团为实现其阴险目的，经常设法在道义上瓦解犯人，培养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以互相监视，使之互相诽谤，并用这种办法使他们争吵得无论在狱中、还是释放以后都无法和解。为准确地达到上述目的，国家保安局机关通常是把道德上不坚定的犯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然后利用他们去实现所谓“改造”犯人的罪恶计划。

国家保安局瓦解犯人的全部工作是从审前拘留时就开始了的。一开始国家保安局在监狱中关进几个犯人，把他们算作“共产党情报局分子”，从乌斯塔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时期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法西斯匪帮的成员——译者注）和切特尼克这些犯

人中間挑选一批奸細組成專門的訓練班，这些人以后就被送往折磨共产党人的各监狱。被捕的軍官如果同意做奸細的話，就答應給以自由。这样，还在审前拘留时期就已經通過各种办法建立了奸細小組，虽然为数不多，但已足够让国家保安局机关以后在集中營中采取大規模的內部恐怖措施了。

法庭审訊是最习見的侮辱。除两、三件例外，所有的审訊都是秘密进行的，除了被捕者以外，参加的是：国家保安局指定的审判委員会成員、檢察官和辯护人。惩罚的輕重是国家保安局事先規定的，某些犯人还接到起訴书，书中指出其罪行和預定的刑罰，而法庭的判决和国家保安局机关預定的是一样的。

被判刑的軍人被送往旧格腊迪什卡的监狱服刑，而通过行政程序判刑的公民則被送往哥里·奥托克从事“感化劳动”。被軍事法庭或人民法庭判刑的妇女被送往薩瓦河上的萊亨堡。某些按照行政程序判刑的人，起初被送往圣格里哥里耶島，然后送往哥里·奥托克。

通往地獄的道路

偵訊之后国家保安局机关就把犯人大批集中起来送往集中營。在前往哥里·奥托克或圣格里哥里耶島时，犯人們被成对地銬在一起，裝在專門的警車上，送往火車站。在押进車廂之前，在站上他們被关进特設的小屋子里，好多人被憋得昏倒。然后从这儿用塞得滿滿的、沒有水和食物的囚車运往巴卡尔——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一个小城市。通常火車是在夜間——即疲憊不堪的囚犯已睡着的时候到达指定的地点。用鞭子、棍子和拳头把他們弄醒。从車站到碼头沿路两旁都站滿了国家保安局的軍官和警察。惶然不知所措的犯人想尽快地通过这个行列，但是往往失足跌倒。国

家保安局人員和警察用皮靴朝他們臉上又踩又踢，催趕他們快些走完这段路。在輪船上先点了名，然后把他們扔进3—4米深的底艙。某些人不知为什么被叫到上面去，然后重新扔进底艙。由于犯人是成对地銬在一起的，因此当其中之一被推往底艙时，他是悬挂着的，因为那时候第二人仍在底艙上面的甲板上受着毒打。在犯人受够了折磨和毒打以后，一批国家保安局人員和警察来到了底艙，在到达指定地点以前的整个航行期間一直不斷地侮辱他們。这些匪徒們一边毒打犯人，一边問道：“在铁托的南斯拉夫你們还缺少什么？”而如果犯人是年輕人的話，就問他，“在战火紛飞的1941年时你在哪儿呢？”接着又繼續毒打，犯人們失去了自制力，甚至不知道周圍出了些什么事情。犯人們經歷了許多許多的波折和磨难，最后輪船終於把他們运到了苦难的島屿。在那里他們是否能得到即使是一点点安靜呢？肯定地說，不能，因为还在底艙他們就听到岸上傳来的号叫声。当他們准备出底艙的时候，一批手操棍子、皮鞭和馬鞭的由奸細中挑选出的打手登上了輪船，并就地开始毒打犯人，最卑鄙地侮辱他們。奸細們朝犯人头上、背上、腹部痛打，用脚又踢又踩。血从嘴巴、鼻孔和胸口像泉水似地流出来。每一个打手都力图更多地痛打犯人，以此向国家保安局的監視者表明自己願意和“敌人”作战。“改造所”就是这样来迎接犯人的。

請看臭名远揚的“排队”

这不过是开始。在监狱里又点了一次名。那些被叫了名字的犯人立即从监狱里爬上来，然后吃力地走到岸上；在这里，等待着他們的是連魔鬼都臆想不到的完全出人意外的事情。犯人在这里排成相距一至两米的两列横队。新来的犯人走过两列横队时，一定要受到站在两列横队中的每一个人的打击。这就是臭名远揚的

“排队”。“排队”是由所謂“犯人自治管理中心”指揮的，而这个“中心”又是由集中營主任、審訊人員、特務和在道德上、思想上墮落成为密探、打手和杀人凶手的犯人組成的。新犯人都必須低着头走进“队伍”，審訊人員和拿着自動步槍的警察則在“队”的兩旁來回走動。有些審訊人員走进了徒手犯人的橫隊，向他們說明打人的方法。多數犯人都在兩列橫“队”中間倒下了，有的甚至当场死去。这全部迫害自始至終夾杂着吓人的喊叫和怒罵：“站起来，站起来！打死匪徒！打死斯大林的走狗！打倒人民的叛徒！”等等。而最大的諷刺就是特務的叫喊：“社会主义的改造措施万岁”，“铁托——現在的列寧万岁！”“我們是铁托的——铁托是我們的！”犯人通过“队伍”以后，往往丧失理性。他們想像不出是誰打他們和为什么打他們，也弄不清他們周圍发生的事情；他們所感觉到的只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許多不止一次看見过死亡的軍官和政委都低下头来，因为这种慘景实在太恐怖了。

甚至在经历过“排队”20天之后，犯人們还不能互相辨认。他們的面孔尽是伤痕，肿得高高的，形状都变了，眼睛变得很小、深深地陷了下去。有許多犯人被打掉了牙齿，打破了鼻子，打断了肋骨。不过这还不是一切。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后來說，还不如在通过“队伍”时死掉，免得還再受沉重的痛苦。

哥里·奧托克的集中營管理处常常組織“排队”，而且經過精心的策划。主任本人和審訊人員都严密地注視着特務和犯人怎样准备“迎接”自己的新难友，看他們是否参加毒打犯人的勾当。的确，許多犯人只是抬起手来，又放下去，裝作打那些新来犯人的样子，至于那些特務和審訊人員、警察和哥里·奧托克集中營主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等，这帮刽子手可就毫不留情了。他們非常残酷地毒打新犯人，以致許多新犯人連“队伍”的中途都走不到，因为那两列橫队排得弯弯曲曲，所以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不能迅速通过。这种“队伍”有时长达两公里。在通过“队伍”的时候，首先支持不住的就是那些在来到哥里·奧托克之前在偵訊监狱的隔离所内关

了一两年的犯人。他們由于饥饿和过去受了种种严刑拷打而虚弱不堪，所以一走进“队伍”就摔倒了，而在受到第一阵打击以后就失去知觉而晕倒在地上。在后面的犯人都想少挨打，所以踏着他们的身体快跑过去。在通过“队伍”以后，那些失去了知觉和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新犯人被送进诊疗所去进行“急救”。审讯人员和监狱的医生就根据对犯人进行“救护”的情况来确定“排队”的效果，而且考察他们之中有没有假装重伤的人。经过这番“考核”之后，当那些不幸的被折磨的人恢复了知觉以后，如果他们还能够站得起来或者勉强行动得了，就被送进牢房去，他们在那又受到一番新的“接待”。根据集中营管理处的指示，对于老共产党员、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军人，都配有专门的特务，这些特务的职责就是要把自己包干的犯人打得比其他的人更厉害，就是说要打个“臭死”。在某些情况下，组织对新犯人的“排队”和“接待”时，以集中营主任为首的国家保安局的官员都亲自出马，而且像布拉托维奇、多米亚诺维奇、罗什特戈拉奇等这样一些大刽子手都亲自参加。例如，当一批老共产党员来到臭名远扬的哥里·奥托克“P—101”监狱时，就组织过一次这样的“排队”。这种场合是不吸收变节分子参加的，以免有活的见证人。当把一大批高级军官由旧格腊迪什卡转移到“P—101”监狱来时，情形也是这样，“迎接”这批军官的只有监狱长、国家保安局的官员和狱警。他们命令这批军官穿过“队伍”，在这里，让他们戴着镣铐（他们来时就戴着）挨打，从下船的地方起，一直打到监狱门口。在这一批军官中有将军四人，久科·米腊舍维奇、韦尔科·日日奇、布兰科·泡利亚纳茨、布兰科·佩特里切维奇；上校三人：弗拉基米尔·达普切维奇、莫姆契洛·纠里奇、萨沃·伏克切维奇；中校三人：内纳德·瓦西奇、莱姆扎·杜腊诺维奇和斯特罗茨基·久科；少校两人：米累塔·佩特罗维奇、迪米特里埃·安德里奇和其他许多人。这次“排队”是最野蛮的“排队”中的一次。

前《人民军报》社长萨沃·伏克切维奇就因经受不住这种“排

队”而死去了，更确切些說，他是被铁托一兰科維奇匪帮的劊子手活活打死的。因为伏克切維奇长期被关在旧格腊迪什卡监狱的隔离所內，只能吃到一点面包和水，已經被饥饿和拷打折磨得瘦弱不堪，以致在路上要由别的同志架着走。尽管他已处在死亡边缘，国家保安局的官員在“排队”时还是拳棍交加，把他毒打得如此厉害，以致他一到“P—101”监狱就死去了。他說，在旧格腊迪什卡监狱里他遭到了各种野蛮的严刑拷打，因为国家保安人員不能从他口中得到陷害一些过去的軍官的材料。但是薩沃·伏克切維奇宁愿坚贞不屈而死，而不願忍辱偷生，不願为了減輕自己的处境而赃害別人。米洛什·馬諾伊洛維奇中校也是这样英勇不屈而死的。他本来被判处死刑，后来被赦免而送到了圣格里哥里耶島。他在通过“队伍”时被毒打得如此厉害，以致当时就死去了，而铁托分子却硬說他是自然死亡的。在监狱当局叫做“迎接——排队”的这种場合下，許多共产党员失去了生命。

作为一种所謂“改造”措施的“排队”，不仅在新犯人来的时候进行，而且在集中营里面也常常实行。例如，在“P—101”监狱里几乎每天、甚至晚間也实行“排队”。“P—101”监狱长办公室在进行“排队”的过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它无法利用老共产党员来实行这项“改造”措施。因此他們不得不强迫一批屈服了的犯人站好，借助这些人来迫使老共产党员参加“排队”。但是国家保安人員即使借助这批人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們又弄来了一批新人。这样作仍然沒有結果。最后就弄来了一批怙恶不悛的罪犯分子和暴徒，他們之中有安格耳科·特韦尔特科維奇和曾經在法西斯军队里打过仗的图戈米尔·科瓦契奇，在东方战线上同紅軍作战时受过伤的腊伊科·科帕弗尼克，在旧格腊迪什卡监狱参加过杀害伊什特万·杜鮑什的尼科拉·普累加什以及其他許多人。在上述这些从来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的罪犯分子的帮助下，监狱长办公室終于組成了一次“排队”。但是，无论采用“排队”办法也好，严刑拷打也好，变节分子进行挑撥也好，监狱长办公室仍

然无法使老共产党人屈服，无法迫使他們签署铁托分子为了毁坏上述这些人的名譽而迫切需要的悔过声明。

修正主义者給納粹分子的 刑罰加添了什么新东西

第一种刑罰就是“排队”，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无例外地必須从这里走过去。在“排队”时如果所有的犯人都积极参加毒打难友的話，恐怕誰也活不了命。毫无疑问，“排队”是铁托分子新发明的同共产党员作斗争的方法。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新发明。他們的暴虐成性的想像力还发明了另外一些新花样。

第二种刑罰就是所謂“站圈”，这种方法的殘酷程度并不亚于“排队”。这是專門在“P—101”监狱里用来作为对于“排队”的一种补充的方法。“站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們簡單談一下。

特务把犯人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圓圈，起初是唱歌，然后就把受害者推到圓圈的中間，把他打得失去知觉。在“P—101”监狱里，每天都有几个犯人（关于这些人，我們在前面已經知道了，他們当中的多数人都参加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在西班牙打过仗）被打得半死不活。“站圈”是一种刑罰，也无異是私刑杀害。“站圈”时獄警經常在場監視“圈”內的行动。有一次，从貝爾格萊德来了一大帮国家保安局的高級官員，要檢驗各种刑罰的效果，他們都站在墙邊观看共产党人“站圈”。这一帮人之中有兰科維奇的副手之一伏約·比拉諾維奇，不久前担任南斯拉夫駐加拿大領事的契累·科瓦切維奇等人。同他們一起的还有哥里·奧托克集中營主任的助手布兰科·达米揚諾維奇。

第三种刑罰是利用特务逼供。这也是铁托和兰科維奇賦有“特殊性”的发明，它不仅用在“P—101”监狱中，而且用在一切关有

共产党人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在“P—101”监狱，特务在深夜把那些被称为“顽固分子”的老共产党员叫起来，带到厨房里，在那里把他们毒打和折磨好几个小时。“顽固分子”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不就答应国家保安人员向他们提出的要求，要不就死在他们手里。

被拷打的共产党人的叫喊和呻吟声，传到其他犯人的耳鼓，他们怀着十分同情的心情倾听着自己的难友在受严刑拷打。那些经历过这种恐怖之夜的人说，倾听难友们号叫，比亲自经受种种毒打还要痛苦得多。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什么刑罚，而是对共产党人的慢性残杀，拉布德·库索瓦茨医生就在受这种刑罚时被打破了耳膜，脸也完全变了样子。

第四种刑罚是体力劳动。这是在所有的集中营以及在“P—101”监狱中都采用的方法。不同之处只是：在“P—101”监狱，这种方法实行得稍微晚一点，就是说，当监狱管理处已经在老共产党人当中安插了大批特务之后才实行这种方法。甚至那些多年从事过最重的体力劳动的人也不相信，连劳动也可以变成最野蛮的刑罚。犯人们被强迫起初把石头搬到一个地方，然后又搬回原处。这就不禁使人想起关于西集弗的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又在铁托的集中营里重复着（西集弗是一个神话里面的人物，他被神惩罚去不断地把石头搬到山上，然后又扔下来）。在“P—101”集中营里，犯人们曾凿了好几个月的石头来作纪念碑之用。当时南斯拉夫不断地迁移和掩埋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士们的尸体，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石块。然而，铁托是多么卑鄙无耻地侮辱南斯拉夫人民的高贵的感情啊！世界上只有那些作尽坏事的人，他们的行为才可以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相比拟，这些修正主义者一方面给牺牲的战士树立纪念碑，另一方面却又拷打和残杀那些战士们的同志。犯人们心满意足地作石块加工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的那种艰苦生活条件下，这就算是“轻微劳动”了。不过在他们服刑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总是日复一日地搬运石头，凿开山崖，修采石场，用一块石头砸开另一块石头。这种情况就形成一种额外的惩罚，

铁托分子力图借此表明，这里的事情完全不在乎劳动，而在于把劳动当作刑罚。

犯人被分成三类：积极分子、 消极分子和匪徒

国家保安局把犯人分成三类：积极分子、消极分子和匪徒。最初，所谓“积极分子”只是那些在严刑拷打下已变成为国家保安局特务的原来的党员。后来，在1952年，在“P—101”监狱内开始把那些在表面上签署了声明，说他们已经悔过并且同意铁托的政策的犯人也算在积极分子之内。哥里·奥托克集中营管理处之所以把这些人列为积极分子，是企图分化老共产党人的坚强集体，并且夸大自己“改造”犯人的成绩，因为上级机关是根据积极分子数目来衡量管理处的工作的。国家保安局除了在集中营内要利用上述这些犯人帮忙之外，在他们出狱以后还要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国家保安局力图破坏老共产党人的名誉，因为，由上面可以看出，本来只有在集中营里的为国家保安局工作的人才得到“积极分子”的称号。这一类犯人拥有很大的特权。他们作比较轻的活，在厨房里工作等等。在分发食物时他们得到最好的一份。由于食物比较好，体力劳动比较轻，睡眠正常以及其他特权，所以积极分子的特点是健康状况很好，而那些“匪徒”即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则一天天消瘦下去，简直不像个人样子。所谓“消极分子”，就是那些无疑是经过毒打之后应付过了审讯的犯人，他们表面上声明说他们改变了立场，但是他们不愿意在各种“改造”形式下面都表现积极。他们常受到特务施加的压力：要他们积极起来、同“匪徒”断绝关系，同国家保安局的活动分子合作。这些犯人中的多数都是忍受不住严刑拷打的人，因为在哥里·奥托克，凡是继续忠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人都遭受过严刑拷打。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也是作稍微輕一点儿的活，他們所处的条件，又比被称作“頑固分子”的“匪徒”要好一些。

折磨“匪徒”的刑訊

哥里·奧托克管理处所謂的“匪徒”，就是那些坚持馬克思列寧主义立場的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审訊尚未結束。管束这一类共产党人的制度是非常严酷的。他們經常作最繁重的活，而且遭受种种严刑拷打。甚至体力劳动对于他們也是不折不扣的刑罰。他們常常受到抵制，在工作时經常有专门派遣的特务盯着，并且每一个犯人都不仅有权力、而且甚至是义务打他們和迫害他們。所有集中营里的情况都是这样。发給他們运石头的抬架是特制的，它后面的把手长，而前面的把手短，这样一来，主要重量都压在“受抵制的分子”的身上，因为他們必須抬前面。他們被迫抬着石头在尖石子上面快跑。如果受害者的动作慢了，特务就把他們罵得狗血淋头，并且恶毒地抽打他們。在苦役期間，特务們一面对犯人施加这种刑罰，一面向犯人逼供，要求他們在国家保安局所把持的口供上面签字。差不多所有这类犯人的脚上、身上、手上都有許多創傷，使他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那是真正的戈耳戈法（耶穌被囚受苦的山名——譯者注）。經经历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西班牙內战的人，在旧南斯拉夫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监狱里遭受过迫害和拷打的人，在法西斯集中营里受过苦的人，以及在过去的各种环境里由于建树了英雄业绩而著名的人——他們因为天天遭受严刑拷打、看到滿目的恐怖景象、而又不可能作点什么有益的事情来改变自己和其他难友的状况，所以往往不禁都像孩子般地哭泣。特务准确地执行国家保安局的命令，

残酷无情地迫害他們。如果某一个特务表現出稍微有一点心軟，國家保安局就会对他进行最野蛮的惩罚。

犯人不穿衣服，餓着肚子在 雪天和雨天工作

由于活儿既繁重不堪又要做得快，所以連变节分子也支持不住，一天当中要实行輪換，而那些“受抵制的分子”則筋疲力尽也不得輪換。为了折磨他們，还发明了一些名叫“天鹅”、“海鷗”的要运250公斤石头的特殊抬架。四个犯人在根本站不住脚的悬崖絕壁上搬运这么大的重量。抬架的裝載情况是这样的，即全部重量都压在“受抵制的分子”的身上（抬架的結構及其裝載的重量前面已經說明了）。許多共产党人由于这种刑罰而变成了殘廢或者丧失了生命。例如一块从抬架上掉下来的石头砸碎了韦科斯拉夫·科洛姆巴里的一只脚，結果不得不把这条腿截除掉。这种情况在扎腊附近的烏格兰島上也发生过。在“P—101”监狱的采石場里，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个名叫佩科（佩特尔·菲利泡夫斯基）的馬其頓犯人死掉了。

冬天，“P—101”监狱和其他集中營里的犯人被强迫餓着肚子、脫了衣服在雨天、雪天和暴風雪中劳动。当局故意長時間內專門不給老共产党人发衣服，讓他們穿得破破烂烂。夏天，犯人們不仅由于过度繁重的劳动，而且由于酷热而痛苦不堪。另外一种刑罰就是渴。甚至犯人在用大桶运水的时候，特务也不讓他們喝水。如果他們之中有誰要水，特务總是說：“当你把案子搞清了、改变了自己的立場、并且把审訊人員所要求的东西都写出来了的时候，我們就让你喝个飽。但是在那时以前，当你沒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一滴水也不叫你喝。”

为了惩罚那些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还采用一种 12 公斤重的大锤子。这种锤子是用来在特务监视之下砸岩石的。铁托集团在折磨和侮辱犯人方面的创造力真是大得很。例如，在毕列奇集中营里，有些犯人的脖子上被系上鞭绳，就这个样子被赶着出去工作。他们的头被戴上妇女用的披巾。一个特务拉着一个犯人的鞭绳，另外一两个特务在后面打他，赶着走，以便快一点把一个很重的东西运到指定的地点。当犯人双手到处是伤，不能用手拿抬架时，别人就用绳子把抬架绑在他们的脖子上。如果犯人由于极度疲劳或受伤而摔倒了，或者讲了一句話，說再也干不下去了，在这种場合下，就采用另一种刑罰。这种刑罰是怎样的呢？

它叫做“加压力”。它的用法是这样的：把共产党员按伏在地上，背上压一块重达 100 公斤的石头。受害者身上由于承担了这样重的压力，喘不过气来，简直觉得每根骨头都要碎了，人好像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犯人凄惨地号叫、呼救，并且答应继续干活。特务把石头搬开之后，又驱使他去干活。“受抵制的分子”由于惧怕再受这种人人为之心惊肉跳的刑罰，就不顾死活把最后的一点气力也使出来继续干活。在这种条件下，往往每个“受抵制的分子”都产生自杀的念头，而且许多人曾经企图自杀。不过这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跟着的人和特务都盯得很紧。国家保安局的机关曾经发出过严厉的警告，說如果某个犯人在审讯结束以前自杀了，就要对其他犯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在“P—101”监狱，当“受抵制的分子”无法再坚持干活时，当场就被叫去走过“队列”。这种情况下的“排队”，竟残酷狠毒到如此地步，例如，当人已被打得失去知觉而不知道是死是活以后，特务还要继续毒打。特务在犯人走过“队列”之后，还继续折磨他，然后放到担架上送到诊疗所去“治疗”，或者更简单地说，送去继续受刑罰。尽管有上述这许多惨象，而兰科维奇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却把所謂“对社会有益的劳动”說成是这样的：“实际上也就是設法給他們（指被监禁的共产党员——譯者注）以机会，使他們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他們自己

的劳动、努力和行为来认识他们的错误和参加我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根据这些非常合乎人情和人道的原则，仅仅处罚他们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劳动。”

多么“合乎人情的”和极其“人道的”原则呀！如果说恐怖的“排队”、“站圈”、累死人的毫无益处的西集弗式的劳动、烧红的铁、或者口渴和饥饿的折磨等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非常合乎人情和人道的原则”的话，那末，刽子手、掌刑人和罪恶的暴徒就都應該算是世界上最人道的人，而且他们之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当然就是南斯拉夫所有地狱般的集中营的积极建立者和组织者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本人了。

然而上面列举的这一大堆刑罚并不只是如此而已。铁托分子对共产党人还使用其他许多刑罚。既有肉体的刑罚，也有精神的刑罚，后者同前者一样残酷，在精神刑罚的折磨之下，人的内心深处的感情、他的尊严、他的人格都受到极大的污辱。还有一种同样极其残忍的刑罚，这也是铁托的“人道主义者”的最“合乎人性”的新创造，就是给什么人施刑，是有选择的：所选择的都是那些曾经为反对占领者和乌斯塔什匪徒而英勇斗争的人，铁托分子毫无良心地把他们赶入集中营里，在那里对这些忠诚的爱国者施行种种刑罚。这一方面是最大的讽刺和卑鄙无耻，另一方面也是说明铁托政权真相的最好的铁证。例如，1956年，哥里·奥托克监狱管理处甚至起用那些罪恶滔天的罪犯分子来给“受抵制的分子”施刑。在旧格腊迪什卡监狱，巴韦利奇手下的前法西斯分子和乌斯塔什分子都被任命为“改造”共产党人的牢房看管人。有一个叫做“懒鬼”的杀人不眨眼的战犯斯捷方·尼科里奇当上了牢房看管人，他残酷地拷打共产党人。他随身带着刀子，威胁着犯人说要割断他们的喉咙。他亲手打断了拉多·拉维捷夫以及其他许多共产党人的肋骨。

还要受許多刑罰

“P—101”監獄对付犯人的第五種刑罰就是所謂“敲腦袋”、“罰站和不让睡觉”。“受抵制的分子”剛剛吃完食物既少且坏的午飯或晚飯之后，在劳累了一整天之后，又被强迫着去把石头砸成碎块，而且不准用铁錘，只准用大石头砸。有时还强迫他們立正站着，他們常常站到半夜或从半夜站到早晨。懲罰許多“受抵制的分子”的另一种方法是連續几夜之内不让睡觉。

当“受抵制的分子”在砸碎石头的时候，特務就四面包圍着他們，唱着侮辱人的歌子，敲他們的头，但不是用拳头，而是用手指头的关节敲。“受抵制的分子”在受这种刑罰的时候仍然要不停地劳动。由于受这种刑罰，犯人往往完全失去知觉，結果穆斯塔法·特爾波尼亞的眼睛都肿得不像样了。施用这种刑罰的結果，首先使人的神經系統受到破坏。

第六種刑罰就是餓刑和渴刑。饥饿、口渴、干累死人的活、殴打以及其他許多刑罰，严重地毀坏了犯人的健康。1952年，不仅在“P—101”監獄，而且在所有的集中營里都有犯人大批死亡的威胁。被监禁的一个医生科学地证明了这种情况。它引起了兰科維奇的惶恐，他亲自去参观了哥里·奧托克的“P—101”監獄。他在那里所看到的不是人，而簡直是一些骷髏，不过他沒有同任何人談过話。他来过之后，为了避免这种世界丑聞，食物稍微改善了一点，但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特別是“受抵制的分子”干的)以及种种名目繁多的刑罰仍然照样实行。兰科維奇的来到还带来了一种新的刑罰，对“受抵制的分子”“排队吐唾沫”。

对那些不願当变节分子 的犯人实行抵制

抵制分輕重两种。对已經判罪的犯人采取这种决定是由集中營管理处确定的，而在实行抵制时，却給新犯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犯人們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国家保安局机关的命令搞的。

“受抵制的分子”遭到駭人听聞的压迫，首先是精神上受到种种侮辱，其次是要做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不准睡觉、挨打等等。他們沒有絲毫权利，得不到任何保护，因为集中營管理处在建立集中營的时候就在大門口挂了一个写着“对于敌人沒有法律”的标語牌。“受抵制的分子”穿的是上了顏色的特殊衣服，人們从远处就可以分辨出来。他們时时刻刻，甚至在別人休息的时候，也要劳动。他們必須保持沉默，不得与任何人談話。如果誰想張嘴哪怕自言自語說点什么，就要受到残酷毒打。每天在劳动之后，或者在晚飯之后，他們都要走过自己牢房前面的“队列”。这种“队列”同前面說过的相类似，不过稍微輕一点。有时在晚間搞“排队”。在更糟的情况下，是在星期天搞全集中營的“排队”，有几千犯人参加。“排队”的訊号使犯人心惊肉跳，因为結果总是有人被活活打死。这种“排队”首先是用来对付那些企图逃跑或拒絕劳动的犯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任意打罵和侮辱“受抵制的分子”，向他們吐唾沫。这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且是那些背叛了信仰的人应尽的义务。誰不这样做，誰就被认为是消极分子，也要遭到抵制。¹⁶实行抵制的时间起碼一个月，长的竟达到十个月，几乎每个已判刑的犯人都要受到这种惩罚，而那些实行反抗的犯人則往往被抵制四五次。当牢房看管人的变节分子拥有最大的特权。他們不劳动，

穿軍官制服，发給他們的烟酒也不限制数量，还可以沿河岸散步。总之，他們有很多优越条件。国家保安局人員要求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折磨、毒打甚至杀害犯人。国家保安局人員却裝模作样，似乎他們并不知道集中營內所发生的事情，而犯人相互之間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犯人的私事。那些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力图向其他犯人說明，国家保安局玩弄种种阴谋詭計，在犯人当中安插特务从而造成种种罪行。不言而喻，这些共产党人的处境是多么困难。这一切都是万分困难的，因为犯人相互接触几乎根本不可能。那些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一般都受到了抵制，因此他們不能开展什么工作。

犯人在判刑后被关进集中营， 但他的案子到此并没有结束

必須指出，犯人在判刑后关进集中营，但他的案子到此并没有结束。实际上审訊正是在集中營开始的，而且一直要进行到犯人获釋时为止。經常有某种新問題提到案情中来，如果犯人沒有什么口供补充，他必須挖空心思去想。犯人常常要把他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以及亲友等說过的話詳細地写出来。当犯人們知道，国家保安局会采用什么样的残酷手段来对付作为“共产国际情报局分子”而抓来的人时，对于他們审訊就是非常可怕的事。审訊人員在审問时，不仅使用直接的肉体刑罰，而且还要用其他手段：欺騙和挑撥。他們使受害者經常处于恐怖之中，弄得他失常，强迫他招出自己的全部亲友。有很多犯人曾經企图自杀，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无法再經受这种拷問，最后不免要被迫招出自己的亲友，而构成国家保安局逮捕他們的罪名。

按照国家保安局的規定，每个犯人关进集中营以后，在两或四

个月之内必须在一次法定人数的犯人参加的会上说出自己的政治信仰。犯人发言以前，被关在临时监狱里，在这里不断对他施加压力进行挑撥和折磨。但是，犯人在囚房里，仍旧没有机会同能够教他如何行动的犯人們交談。监狱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一个犯人在全部监禁期間，总是有特务盯着，他們不但折磨和迫害他，而且千方百計地劝他必須反省自己的行为，强迫他在其他犯人面前說話，而且要把受审时所要求他讲的一切都說出来。他必須把自己說成一个最坏的人。犯人在談自己的行为时，必須保持这样的姿态：低着头，把双手放在背后。如果他不这样做，一群特务就会向他猛扑过来，痛打一陣。犯人必須詳細說明自己从生下来直到共产国际情报局发表決議（这是自傳最重要部分）时止的情况，接着从发表決議日起說到被捕时为止，最后从被捕起說到讲明自己的政治信仰时为止。犯人在发言讲到自己的行为时，自然会表現惊慌和胆怯；他觉得听众都是厌恶他的。他低垂着头，弄不清誰在罵他，誰在打他。有些犯人面对着各种严刑拷問，由于怕死，就被迫招认說，似乎在苏联学习时，在那里当过間諜，在战争时期做过納粹秘密警察局或者意大利特务机关的特务，或者承认自己是怕死鬼和逃兵，等等。也有这样一些犯人，他們由于害怕而承认，似乎他們曾經同时当六、七个外国特务机关的間諜。如果誰后来想否认这种自我誣蔑的捏造，誰就会大倒其霉。例如，斯罗波丹·波伊奇是斯勒姆的一个农民，他被迫伪供战时做过納粹秘密警察局特务，而且由于他的罪过有 55 个同村老乡遭到枪杀。但后来波伊奇声明，上述伪供原来是审問人員逼出来的，結果他便被活活打死了。

国家保安局还要求犯人，特別是要求那些著名的党员和已婚男子，說出与哪些妇女发生过关系的各种材料。这种消息的用处在于破坏犯人的名誉，并渲染說：“瞧！拥护共产国际情报局決議的就是他們这伙人。”犯人自我誹謗和誣蔑得愈厉害，他挨打就愈少，并且被认为具有“改过自新”和“重新作人”的表現。特务經常盤問犯人一些事情，使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特务又大吼起来：

“打倒匪徒，抵制匪徒！”

审問人員的任务是 尽可能多地培养特务

犯人是否改变了政治信仰，不是根据体力劳动来判断的。犯人們常常被要求表現“积极性”和“参加反对敌人的斗争”，即反对共产党人。书面声明和口头声明被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审問人員根据这些材料提出决定意見，把他們对每个犯人所采取的措施报告上級机关。他們对这种事情非常重視，因为他們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犯人的精神崩溃以后，从其中尽量培养大批的特务。

这里必須指出，国家保安局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初期，在新来犯人和某些老犯人当中。国家保安局全力在犯人中間造成互相猜疑的气氛：似乎一个人要相信另一个人，必須花費很多时间。某些犯人甚至对自己也丧失了信心，认为自己无力反抗。全部“改造”机关都必須使每个犯人产生一种孤立的和孤独的感觉。国家保安局千方百計使犯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的全部难友都在反对他。一个犯人是否反对那些在监狱中坚决进行反抗的民族解放战争领导人，是否反对 1941 年的游击队员，特別是是否反对战前的共产党员，这是一种衡量他改造程度的标准。国家保安局經常迫使犯人走上这条道路，用一切手段强迫他們反对那些繼續反抗的人，以便后来清除这些人影响。

有些在意志和思想上比較脆弱的犯人漸漸参加特务机关的工作，結果成了叛徒。这些叛徒为自己的行为辯解，說什么只有这样作才是脱离监狱的唯一机会。这样一条道路，如果他們一直走下去，当然，一定会导致犯罪活动。国家保安局在达到目的以后，常把这样一些人放出监狱，并且利用这种釋放来达到它們的宣傳目

的。这些人出獄以後，又被吸收去干監視活動和特務勾當。此外，他們還被派到犯人會上去作“自我反省”，說什麼他們自己曾經被卑鄙的動機所驅使，走上了叛變道路，“擁護過共產國際情報局的決議”，而現在在政府幫助之下，他們才得到了“改造”。

納粹秘密警察局集中營的經驗

國家保安機關的軍官和審問人員利用達卡烏、布肯瓦里德和阿烏斯維茨等集中營里納粹秘密警察的經驗，大力建立了各種特務組織，然後通過它們去招募其他人員。招募工作在犯人被轉押到集中營去以前要拘禁一個時期的臨時監獄里就已經開始。每一個新犯人都迫切盼望能夠進入集中營，因為他們認為，在那裡可以找到很多老共產黨員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堅定的戰士。國家保安局很了解這一點，因此，在1951年就建立了一所臨時監獄，在那裡，任何一個犯人都不敢和其他犯人保持聯繫。與新犯人同來臨時監獄的還有許多最有經驗的特務。他們的作用是各種各樣的：一部分特務是專門打人、搞迫害活動和強迫犯人在審訊記錄上簽字，另一部分特務則專干欺騙勾當，裝得儼然如新到犯人一樣。他們被責成去公開煽起反對“改造”的抵抗活動，爭取新到犯人的信任，並用一切辦法接近這些犯人。為了實現這種詭計，這批特務也同其他犯人一樣，遭到迫害和拷打。他們在取得新來犯人的信任以後，便告訴這些犯人說，集中營里有秘密黨組織，並且說出這些新犯人在被捕前曾聽說過的某些人的名字，例如，他們說，所有這些沒有出賣共產主義榮譽的黨員都加入了這個秘密組織。如果新犯人中了這個詭計，就必須具結，保證至死也不把組織出賣給任何人。然後，這些特務便要新犯人每人都把自己在被捕前的共產主義活動、同其他人談過一些什麼話，通通告訴他們，並介紹他們

与志同道合的人通信，而这些信件“組織”可以很容易地設法送出监狱去。这些特务在离开临时监狱以后，同他們繼續保持联系，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以前被监禁过的共产党员与新犯人发生了接触，并且把集中营內的真实情况告訴了他时为止。但是，現在已經迟了：現在他已經陷入了国家保安局的罗网了。

国家保安局想尽一切办法，在犯人当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背叛信仰、与铁托的全部政策妥协和充当特务的道路，另一条是繼續搞工人运动的道路，这就意味着終身监禁。国家保安机关为了使犯人了解沒有其他道路可走，曾一再将試图逃跑的犯人当众活活弄死。在弄死以前，狠狠拷打，目的是要了解，誰會帮助他准备逃跑，然后用纏绳套着脖子把他牵出去，当着所有排着队的犯人活活打死。在战时当过紅軍軍官的弗拉斯契米尔·彼得洛維奇，就是因試图从圣格里哥里耶島集中营逃跑而被这样活活打死的。国家保安机关常用每个犯人的死亡来影响其他犯人的心理状态。而在集中营里每天都死人，因为极端残酷的痛苦、饥饿、干渴和沉重的体力劳动促使各种傳染病的流行。

犯人怎样受侮辱

国家保安机关特別好使用侮辱手段，凡是触犯人的尊严的办法，它們都加以采用。这些办法首先是用来对付老共产党员的，因为对于他們，保安人員力图借以强迫他們背叛自己立場的其他一切办法都不起作用。侮辱人的审訊从被捕的最初日子起一直繼續到釋放出獄为止。国家保安局知道，为了摧毁一个人，首先要根除他身上存在的人的感情和共产主义的感情，于是采用最駭人听聞的侮辱方式。甚至許多无法說出口的最下流的罵人話和向臉上吐痰的办法，在这里都成了家常便飯。保安人員用最下流的話辱罵

犯人的母亲、妻子和姊妹。但是，在他們的侮辱办法的武庫里，远不止于这些东西。在旧格腊迪什卡监狱里，他們常把判刑的军官头朝下倒吊起来。他們每天晚上都举行斗士游戏，强迫“受抵制的犯人”互相殴打，一直打到失去知觉为止。他們对拒絕参加游戏的人，便用最残酷的办法来加以惩罚，例如，用紙烟燻他們的鼻子，用水灌鼻子，强迫他們做狗叫，互相当馬騎。

有一位馬利揚·莫施科維奇，是游击队的老战士和指揮員，他的两个兄弟和他的妻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他被迫在脖子上套着貼有写着下流話的紙条的狗鎖鏈，在新犯人面前奔跑并且做狗叫。彼得·米奥得拉戈維奇，也是老战士和1941年时的部队指揮員，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总委员会的人民代表，他竟被迫光着身子，手拿圣像，当着犯人在室內爬行。米兰·阿布腊莫維奇是上校师长，荣获过英雄称号，特务們在他背后系上一条牛尾巴，他在集中营內干活时必須帶着。薩沃·斯塔諾也維奇是一位上校、人民英雄，战时最著名的勇士之一，特务們却用侮辱和折磨办法，强迫他在同室的犯人面前哭泣。斯塔諾也維奇受了这种侮辱以后，曾企图自杀，結果終身变成了殘廢。为了尽量侮辱共产党员，在毕列奇組織了一个所謂“出售腐烂物”的企业。在这个“企业”里工作的犯人必須泡在糞坑里。然后，特务把他們从那里捞上来，叫其他犯人看他們被弄成了什么样子。生长在策腊的六十岁的久科·米腊舍維奇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荣获过矿工英雄和卡伊馬克卡兰英雄的称号，在旧南斯拉夫军队里得的勋章最多，他被强迫学做狗叫，最后被宣布为三个外国特务机关的特务。特务們为了更加恶毒地侮辱这个善良的人，竟强迫他赶两头毛驴，去运各种髒东西。切特尼克們还給其他許多犯人粘上土匪的鬍鬚，頸上挂起写着下流話的紙片，强制他們在所有犯人面前，說自己是撒謊者，等等。

国家保安局除了上述办法以外，还采用一种心理拷問办法。铁托分子知道，如果不首先从思想上使共产党员屈服，要强迫他們放棄自己的政治信仰，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他們想尽一切办法

來鏟除他們對蘇聯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信心。他們強迫過去在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呆過的犯人，尽量以書面的和口頭的形式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誣蔑。如果誰不同意這樣做，誰就會被宣布為蘇聯的間諜，遭到不斷的拷問。這種“政治理學時間”常常安排在晚上下工以後，那時候犯人已經很疲倦，連對他們說些什麼話都聽不清楚。如果保安人員發現有人打盹，或者不能回答提出的問題，就實行毒打。同樣，不願發言和不願誣蔑蘇聯的犯人，都要受到抵制和迫害。

犯人對集中營里的各項措施，都必須認為是必要的措施，是使他們能夠回到人民當中去的唯一機會。他們在通過“排队”的時候，必須用好話贊美鐵托政權說：“所有這一切對我們都是必要的。瞧！這對我們多么人道啊！如果我們是在別的國家，准會因叛變罪而遭到槍殺。”這些不幸的受難者在做完一件沉重的體力勞動以後，又必須按照國家保安局的教導，贊揚今后將要作的事情說：“你看！黨對我們多么關心！它給我們勞動的機會，要是關在某間班房里，真會悶死人”。任何犯人都不敢直接用集中營這個名詞，而只敢叫做“勞動場所”。誰也不敢說：累了、餓了、口渴了，或者說集中營的生活很苦。他們必須把受抵制的人叫作下等人、懦夫、強盜和騙子。誰如果胆敢說那些犯人中某人哪怕一句好話，他就会被當作敵人受到懲處。

“P—101”特種集中營或死亡坑

亲爱的讀者！你們已經知道在哥里·奧托克有一個“P—101”監獄——集中營的監獄，或者說，十八層地獄。你們一定痛苦地耽心你們牢記在心里的那些老共產黨員所受的折磨，雖然，我們僅就他們一生中眾所周知的事情說了三言兩語；你們不僅知道了各个

監獄里挨打、受苦和遭受殺害的人們的詳細名單，而且了解了那些妄想把自己打扮成“人道主義者”的人們所精心製造的各種刑罰名稱；你們已經相信，這些“人道主義者”的目的不是別的，而是要消滅大批大批的人的理想，當他們達不到這個目的時，就砍去那些人的頭，以便消滅思想，強迫人們投降，迫使人們走上叛變和犯罪的絕路。你們已經看到，他們對被關進十八層地獄即“P—101”特種監獄的犯人，使用了最殘酷的刑罰、最卑鄙的和最侮辱人的手段。我們曾考慮了很久，在這本小書中還要不要專用一章寫“P—101”特種監獄，因為以前我們已經說了很多關於它的情況，而且我們已經情不自禁地重複過一些我們早已說過的事情。然而我們還是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我們不把“P—101”監獄專寫一章，我們就無法說明鐵托式的集中營和監獄的本質，如前所說，這些集中營和監獄可以說最能表明南斯拉夫“特殊的社會主義”本質。儘管我們不想重複，但某些說過的事情仍然不得不重複。親愛的讀者，當你們讀到這本小書的時候，你們讀到共產黨員同志們是怎樣慘遭殺害的時候，你們好好想像一下在那暗無天日的十八層地獄里極其殘酷地首先是对共產黨員實行的一連串的嚴刑拷打、侮辱和挑撥吧。當你們讀到奧茲蘭是怎樣被殺害的時候，請不要忘記，還有1 000多名共產黨員都是這樣慘遭屠殺的。還請你們想像一下那一連串的拷打、侮辱以及其他刑罰；請你們特別注意，這一切都發生在“P—101”監獄，然後你們就可以得到一個虽然是模糊的、但卻是比較全面的印象：即什麼是犯人如實稱呼的所謂死亡坑。但是，請別忘記，被投入其他監獄和集中營里的還有三萬個左右的共產黨員，他們也受過這樣許多刑罰的折磨。

我們已經說過，還在共產國際情報局決議公布以前，鐵托起初是堅決反對党的老干部。他几乎把他們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以前曾在蘇聯呆過的干部，撤離了機要的崗位。這裡必須補充一句：鐵托從一領導黨起，就开始清除最忠誠的黨員。與此同時，他拉攏了許多阿諛奉承、钻營名位的人和其他嫌疑分子，因此，前南斯拉

夫共产党領導的瓦解过程不应当从 1948 年算起，而是在很早以前……赫布朗格和朱約維奇并不是铁托的头批牺牲品。

铁托决心肆无忌憚地逮捕一切老共产党员，因为他深知，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定会反对他那种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政策。我們也已經看到，上述許多共产党员都被送进了哥里·奧托克——恐怖和死亡集中营。

国家保安局在集中营的斗争过程中看清楚了，老共产党员实行反抗的比其他犯人更多，而他們本人的榜样又影响其他犯人。因此，为了更快地便于从意志上和思想上使共产党员屈服，在哥里·奧托克設立了一个“P—101”特种集中营，主要是把那些反抗所謂“改造”政策的比較著名的老共产党员送进去。在 1951 年初，还把一批无法屈服和分化的軍官从旧格腊迪什卡监狱轉送到了圣格里哥里耶島。这批軍官中的一部分反抗最激烈的人被押送到了“P—101”。国家保安局认为，把这些軍官分开，才便于制服其他軍官，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实现它那罪恶的“改造”計劃。

在“P—101”有一个深度和直徑各約 10 米的大坑。坑里盖了一个不大的牢房和一間厨房。坑的四周筑起了一道高达 3 米的圍牆，墙上有哨兵站崗。在这个坑里关了 117 个犯人，其中有一部分是精选过的特务。在这里，犯人的处境比在其他集中营里更加孤立得多。甚至連国家保安局的軍官和島上的警察也不敢走近大坑。犯人在坑里被迫互相殴打，彼此折磨，目的是要挑起仇恨，从而使他們斷絕来往。“P—101”由野兽般的制度統治着。犯人痛苦地眼看着特务們常常用最残酷的手段毒打、侮辱和折磨很年老的人和老共产党员。国家保安局在使用第一批特务无效以后，便派进一些新特务到“P—101”去，并且对犯人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即使用尽这些伎俩仍然无法使大多数老共产党员屈服。

共产党员的处境多么痛苦，他們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这从下列所写的几件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

根据铁托的命令（为了报复），奥茲兰遭到严刑拷打并且被杀害了。特务每天拷打他。当时全体犯人都知道，特务力图尽快杀害奥茲兰。他同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在1949—1950年就处在生死关头。在那个时期，铁托和他的同謀者特別妄想要老共产党员提出“悔过声明”。

当犯人們拒絕提出这类声明时，当局就大大恶化了本来就很残酷的监狱制度。前联邦政府的部长沙瓦·茲拉奇茨和切尔諾哥尔斯克政府的部长尼科·巴維奇就是被这些困难条件所压服的。他們的声明后来曾經发表在《战斗报》上。但是，在老共产党员当中，却沒有一个人提出“悔过声明”，也沒有人像茲拉奇茨和巴維奇那样做，因此，监狱管理处吸收大批特务，把他們派到“P—101”监狱去折磨老共产党员的勾当。因此，监狱成了真正的地狱。奥茲兰就成了这批特务的第一个受害者。这是一个身体健康、意志坚强的人，他能够經受最残酷的拷問。警察中士科斯罗維奇不止一次地注意監視，看特务們怎样拷問奥茲兰，有一次，当他认为特务們沒有很好执行任务时，这个劊子手就亲自把奥茲兰叫到管理处去，在那里极端野蛮地毒打他，这个不幸的人就这样忍受不住毒打而死去了。当犯人們把死者尸体抬走的时候，科斯罗維奇向大家喝道：“快把这骯髒的东西弄出去。要知道，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莫斯科的一切特务。”据南斯拉夫流亡者說，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奥茲兰是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铁托恨他，是从他們两人同在莫斯科的时候开始的，而当奥茲兰在1946年剛回到南斯拉夫的时候，铁托便想向他报仇。他很快被关进了监狱，但铁托要把他交付法庭审判并加以杀害的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国际情报局的決議公布

以后，形势改变了，铁托就趁机用最残酷手段来消灭这位鋼鐵般的布尔什維克。国家保安局把对奥茲兰的杀害，照例說成是自然的死亡，但他本人在死前对同志們說过：“同志們，我是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如果你们之中誰能活下来，请告訴我的妻子，他們是怎样杀害我的。你们决不要投降，宁作英雄而死，决不屈辱偷生。”

哥里·奧托克集中營的其他监狱也使用慘絕人寰的恐怖手段，来消灭信仰最坚定的共产党员的肉体。瑞基奇將軍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一年期內的深夜審訊

瑞基奇將軍在战前就是过去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旧南斯拉夫的皇家警察局曾拷問过他，但他在阶级敌人面前表现得非常坚定。在臭名远揚的贝尔格萊德监狱里，警察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那时候党内同志都赞扬瑞基奇，說他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精神财富。他在战争时期在霍尔瓦茨卡担任过总参谋部的主任，战争结束以后，他是南共中央委员和霍尔瓦茨卡政府的工业部长。起初，他对铁托的领导抱有幻想，但他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就看清了铁托在把南斯拉夫領到那里去。他在 1950 年同波什科·布尔基奇、恰尼查·奥巴齐奇等两位部长一起，公开反对铁托和兰科維奇的政策。在这个时期，他的立场对铁托集团是很大的威胁，因此，他与上面两位部长一起立即遭到逮捕。铁托分子把拉德·瑞基奇几乎单独监禁了两年之久，因为他們无法使他屈服，同时他們又不敢把他送到哥里·奧托克集中營去，因为那里由于犯人发生分化而正在进行尖銳的斗争。铁托分子认为，如果他在那个监狱，这对他們是一种很严重的危險。拉德·瑞基奇的这种偉大精神力量，能够使国家保安局以往在整顿“改造”办法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

归于无效。只是在监狱制度得到某些巩固以后，拉德·瑞基奇、波什科·布尔基奇和恰尼查·奥巴齐奇才被送到哥里·奥托克。

1952年2月，对瑞基奇实行了一套专门的办法。哥里·奥托克集中营的其他犯人通常都要在犯人面前谈自己的政治信仰，但他不这样做，这倒不是由于他不愿意表明自己，而是为了免得惹起国家保安机关对他的怀疑，因为它们害怕他可能说出某种不利于它们的事情。因此，特务们常常对他实行抵制，除了监狱长以外不准他同任何人谈话。起初，特务们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他屈服：把他关进采用特殊审讯方法的地牢。但在经受了三个月的审讯以后，他又被送回牢房。监狱长派了一个伪装犯人的特务盯着他，监视他的行动，看他做些什么。以后，他便受到一种长时拷问方法的折磨。在一年当中，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一间单独的房间内对他实行拷打。但是，拉德·瑞基奇没有屈服，他甚至一句话都不说。他处在这种难以忍受的境地，便决定宣布绝食，一直继续到连半分气力也没有了。许多与绝食者打过交道的医生都说，瑞基奇是个奇人。他在47天内没有吃一点东西。于是他被送进医院，强行注射营养剂。后来，哥里·奥托克管理处对他采用了另一种办法。他在医院里被押进另一个已经成为铁格子牢房的房间。食物从门上一个小洞口送进去。水门汀地上铺了一些稻草，总共才给一条被子。跟我们谈话的人都说，拉德·瑞基奇活着时再也没有出来过，只是死了以后才离开这间牢房。看守牢房入口的警察，甚至不准他出来上厕所。

妄想使拉德·瑞基奇屈服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在1954年3月进行的，跟我们谈话的人说，这正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斯维齐斯拉夫·斯捷凡诺维奇亲自来对付他的时候。特务对他来说，斯捷凡诺维奇部长和哥里·奥托克监狱长韦谢林·布拉托维奇想跟他谈话，他拒绝谈话，回答说：“我同这种罪恶分子没有什么可谈的。”大概，这就是他最后说的话。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英雄拉德·瑞基奇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1954年3

月，当一批军官犯人被押到哥里·奥托克的时候，听说拉德·瑞基奇还活在那间可怕的单身囚室里。但是，他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大概国家保安机关这时已经把他杀害了。送给他妻子的死亡通知（虽然兰科维奇的警察很少这样做）证实了这种推测。铁托及其同谋者也极力把瑞基奇的死说成是一种自然死亡。尽管拉德·瑞基奇和波什科·布尔基奇关进监狱比其他人都晚得多，但他们在此之前，对南斯拉夫各集中营和监狱里究竟受着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的统治，甚至是一无所知的，虽然他们两人都是南共中央委员。

当南斯拉夫流亡者谈到拉德·瑞基奇、奥兹兰和其他难友的牺牲时，他们的声音低沉，脸色悲哀。显然，这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的同志而感到深深悲痛的反映。这里必须补充一下，这全部叙述都充满了耽心自己同志的命运的痛苦，充满了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命运的忧虑，因为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他们曾经在皇家监狱里，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在铁托和兰科维奇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却洒过无数的鲜血，饱尝过无数的苦难。他们在专门叙述拉德·瑞基奇和奥兹兰被杀害情况时，声音常常很高，同时带着失望的语调，从他们脸上，流露出一种为两位受难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和英雄主义精神而感到自豪的表情，因为这两位党员保持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对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抛出了无限蔑视的眼光。虽然，南斯拉夫流亡者对我们还讲了其他一些惨遭杀害和受折磨的共产党员的情况，还说了许多其他事情，但关于这点我们打算只讲到这里为止，另外，想讲一下集中营生活中的一些其他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也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政权极为黑暗的方面。

要想出监狱，必须烧毁一切桥梁

按照铁托和兰科维奇的说法，犯人要想出狱，必须“烧毁”連結

他和共产主义的“一切桥梁”。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达到下述条件：

表明犯人改过从新的第一个标志是打消一切顾虑。这就是說，他必須出卖那些尚未暴露的和反对铁托的共产党员。某些犯人由于經受不住审訊时的严刑拷打，便誣告那些根本无罪而随后被捕入獄的人。因此，同共产党情报局決議毫无关系的南共党员也大批被捕入獄。这样被捕入獄的有几千人。还有几万人是准备加以逮捕的。监狱中塞滿了共产党员。后来，国家保安机关考虑到如果继续这样做，他們就不得不逮捕成千上万的南盟盟員，于是才停止了那种仅仅根据囚禁在集中营和监狱中的过去的党员受严刑拷打时逼供出的材料而进行的逮捕。然而那些招假口供或在受审过程中乱咬无辜者的犯人却仍被国家保安局看成积极的犯人。但是这一切还不能算是“燒毀桥梁”。

审訊以后，犯人必須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監視和他一起囚禁在监狱或集中營內的自己的同志。根据同哥里·奥托克监狱管理处合作的犯人提供的材料，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遭到拷打。这种向监狱当局的告密，不仅采取口头方式，而且采取书面方式。国家保安局仔細地收藏着各种书面证据。这种事使受害者同铁托集团的命运有了新的联系，因为它使人变成了奸細。然而，犯人如果想成为“已燒毀一切桥梁”的人，这还不够。国家保安机关利用已堕落为奸細的犯人在其他犯人中进行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国家保安机关有一个詳細拟定的計劃。如上所述，这个計劃由各种奸細分別完成，即一部分奸細充当用刑的劊子手，其余的則監視犯人。在大多数場合，奸細們都担任囚室室长、副室长、上等兵、队长等等。他們同国家保安机关一起，并且按照它們的指示在哥里·奥托克犯下了无数罪行。例如，他們在集中营杀害了南共科索沃—梅托希亚区委会委员、过去最老的党员之一奥梅尔·切尔凱茲和腊伊切維奇博士教授以及医生普雷梅尔里·安德里亚紹維奇等人。为了奖励杀害奥梅尔·切尔凱茲的行为，凶手得到釋放。这里指的是

扎莫·切基奇，他是前国家保安局军官，曾在哥里·奥托克当奸细。另一部分奸细的任务是采取相反的立场，即向犯人献殷勤，而不是拷问和折磨犯人，并且一般地对犯人保持最友好的态度。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时必须不使人产生任何怀疑。许多犯人由于过去从未坐过牢，没有同奸细作斗争的经验，他们时常成了奸细们的牺牲品。某些犯人看到已经陷入罗网，便屈服了，自己也就成了奸细。不愿当奸细的人则受到最残酷的折磨。第三部分奸细直接在犯人之中培植，从形式上看，他们是犯人最坏的敌人。前上校莫姆契洛·帕累克西奇和中校维尔科·托米奇以及伊利亚·卡列维奇是搞这种特务工作的著名人物。帕累克西奇和卡列维奇出狱后仍然继续他们的奸细密探工作。

犯人变成告密者以后，审讯人员就要他参加侦察其他犯人的案件，同样地也要他拷问和毒打他的同志。如果犯人动摇或者拒绝，他就会重新遭到拷打，并且被称作“投机分子”或“伪君子”。但是，即使他认真地干他的罪恶勾当，对哥里·奥托克管理处来说，这还不能证明犯人已经“烧毁一切桥梁”。

除去其他一切之外，当犯人学会了南斯拉夫报刊上经常发表的各种反苏的毁谤捏造时，才认为犯人的行为经过了充分可靠的考查。每天用来开导犯人的一切反苏材料所追求的目的是以仇恨苏联、苏军和苏联共产党的精神对过去的南共党员进行“思想改造”。所谓“老练的”和“受抵制的”犯人无权阅读任何书籍，整年看不到一份报纸。国家保安机关认为，犯人如果什么也不读，很快便会投降。此外，“经过审查的犯人”在哥里·奥托克期间必须每天在其他犯人面前公开反复地说，“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蜕化了”，“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受到的剥削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重”，“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想奴役各个大小民族，其中包括南斯拉夫”。

许多犯人必须写悔过书，在报刊上公布，以此证明自己“改造好了”。

在离开监狱或集中营之前，許多經過审查的犯人必須具結保證釋放后为国家保安局服务。如果受害者出獄后确实繼續从事密探特务活动，这时，国家保安机关才认为他們是“改造好的”犯人，并且分配工作。然而，真正死心塌地地准备跟随铁托和兰科維奇的“改造好的”犯人是比較少的。国家保安局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大多数“改造好的”犯人仍然特別警惕，而且往往不給他們任何好工作、任何适合他們专长的工作。現在，他們已經成为哪里都不合适的无用的人。

对被监禁共产党人家屬的迫害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早已变成一伙政治罪犯匪帮。因此，他們甚至对被监禁的共产党人的家屬都不饒恕。处境最感困难的就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員以及軍人的家屬，因为他們在战争結束以后完全靠領工資維持生活。而这些人多半是人民大批参加民族解放军的地区的工人和农民，他們的家园都被占領者及其走狗燒毀了，財物被搶劫一空；被监禁的共产党人的大部分家屬都远离自己的家乡以及能够給他們以力所能及的帮助的亲人。剥夺这些人的自由也就等于剥夺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起碼的生活資料。照例，这些家屬都离开了大城市，因为他們在大城市很难找到工作。在大批逮捕时期，許多家庭为了寻找栖身之所而迁移的这种現象，与遭到大火災、大水灾或战争时期的搬家的情况頗相似。那些有亲友的家庭，而其亲友又敢收容他們的話，可以搬去；而在有些家庭里，由于父母都被监禁，孩子們就流离失所。这样的事多得数以千計。讓我們在这里說一說因企图越境而被打死的南斯拉夫空軍上校米尔科·舍巴諾維奇的情况。他的妻子从 1941 年起就是第一无产阶级突击队的游击队员，在战时失去了一只手，被逮捕后，送

到了哥里·奧托克集中營，使他們的唯一的九岁女儿无依无靠。两个老共产党员、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的这个女儿，就因得不到任何关怀，无法生活，无人监督，而从十三岁起就在道德上堕落了；为了生活，被迫出卖自己童年的肉体；她的母亲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忘記了在铁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集中营內所受的一切苦难，忘記了亲爱的丈夫的牺牲。她之所以活着和情願挨苦受难就是为着自己的女儿，然而她发现她的女儿成了什么样子啊！对她來說，这比集中营里的生活更加惨痛。

再看另一件事。老革命家、多年的联共（布）党员伊万·科尔出獄后，不知道自己的家——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下落。他妻子是俄罗斯人，因为她在南斯拉夫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被迫离开自己的孩子，住在各种貧民窟里，为了保住这条命什么活都干。她整年整年一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們的命运。当丈夫出獄后，她費了很大勁才认出来。可怕的生活条件在他們两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他們两人都完全变了样子，蒼老了。經過长期寻找，父亲終于得知自己的女儿在收容所里。当父亲去接她时，女儿认不出父亲，根本不承认他是自己的父亲。他又費了很大力气才在格尔策哥文的一个远亲那里找到一个儿子。这种事例在南斯拉夫并不是个别的，这就是铁托的“人道主义”以及他“对人的关怀”的明证。

国家保安局和 KOC（军队侦察机关）的軍官們在逮捕人时的沒有人性的行为，对被监禁者的家属会造成什么后果，他們是漠不关心的。再举一个例子，久科·米腊舍維奇将军和他的妻子是在学校放假、他們的孩子不在家的时候被逮捕的。当孩子們回家以后，发现房子已經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占了，家具已被沒收，所有的財产都被搶走了。南斯拉夫流亡者告訴我們，很多人可能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要破坏青年一代的理想？他們本来是應該受到社会主义精神的教育、繼續踏着自己父母——共产党人和革命家——的道路前进的。这个問題由当时南斯拉夫資產阶级唱的这

样一句歌曲回答了：“铁托同志——白色的紫罗兰，一切反动派都爱你呀！”

国家保安局竭力破坏犯人的家庭， 并使他們的家屬腐化墮落

为了达到他們的卑鄙目的，国家保安局巧妙地利用了被逮捕的共产党人的家屬求生存的斗争。如果被捕者的妻子是南盟盟員，那就要求她非同丈夫离婚不可。就这样，在南斯拉夫被破坏的家庭数以千万計。保安人員还企图逼迫很多犯人的妻子当妓女，以便后来向人說：瞧，他們“这些共产党情报局的拥护者”是一些什么人。除此之外，国家保安局的軍官要求家屬具結，同意要揭露任何想同情他們不幸遭遇的人。当这些手法不能奏效时，保安人員又采取了羈押的办法，进行偵察，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最能恐吓家屬，使他們之中总有人同意做特务。如果用这种手段能够打开一个缺口，那他們就用尽心机扩大这个缺口，直到把婚約廢除并且把犯人的妻子变为自己的奴僕为止。如果犯人有兄弟姊妹在国家机关或军队里工作，就逼迫他們公开宣布和他脫离关系。国家保安局想尽一切办法使他們为它工作。在一些被拖下水的家庭內，它的成員同意与国家保安局合作，結果儿子向父亲作密探工作，父亲向儿子作密探工作，兄弟夫妻之間互相作密探工作。甚至小孩子也必須提供关于自己最要好朋友的情报。

如果誰胆敢帮助犯人家屬，他就有丧失工作、被捕和坐牢的危險。例如，被铁托分子枪杀的人民英雄阿尔索·約万諾維奇的家屬，就生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許多在监狱里被枪杀了的共产党人的家屬就过着叫化子式的生活。但是，这点不是說铁托和兰科維奇能够把南斯拉夫人民恐吓到如此地步，以至他們根本不

敢再同恐怖活动的牺牲者团结和联系了，因此铁托集团看到人民有不满情绪，并且害怕他们的愤怒，就被迫做一些让步。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允许被监禁的军官的家属给他寄包裹（而按正式的规定，犯人是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收到包裹的），其次允许他们在星期天和星期六下午，在监狱管理处专门安排好的房间里同家人见面。头几次面对犯人来说真是重大事件。因为第一，很多犯人长年一点不知道自己家庭的情况；第二，大多数犯人都挨饿得消瘦不堪，一心想收到一点食物。会面的房间布置得很好看，其目的是吸引探亲者的注意，并且表明国家保安局“十分关心犯人”，同时给人造成一种认为监狱中的生活条件不坏的印象。在会见家人时，犯人必须刮脸、理发、弄得干干净净、穿上只是专为这个时候穿一下的新制服。看守人领着探访者在犯人来到以前先在指定的地方坐好。会见时间可以长达20分钟，这根据犯人属于哪一类而定。这种会见是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的。一般禁止犯人和亲人拥抱。在谈话时审讯人员告诉探访者说，犯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当然也就不想出狱了。因此犯人就不敢讲自己的真实情况，很多审讯人员就在中间捣鬼，要求探访者同犯人断绝关系，再也不理他了。

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母亲和妻子，她们穿着黑色的衣服，好像送葬一样。任何气候条件都不能阻碍母亲花费很多钱从远处来看望自己的被监禁的儿子。她们几乎每月都来看望自己的儿子。每个母亲都想尽一切办法准备并且尽量多带食物到集中营去，因为她们每个人都知道她们的被监禁的孩子忍饥挨饿，之所以有罪，只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苏联，只是因为他们坚决地维护真理。

老女教师、约卡·维西奇在她儿子被关在毕列奇集中营的整个时期内，她每月都去探监。她给儿子带来了两包食物。审讯人员发现这个勇敢和有教养的女人显然不满意这个制度，因此不放她的儿子沃依斯拉夫·维西奇出狱；结果这个高尚的青年人在1956

年死在铁托的集中营里。这位母亲十分悲痛，她由于热爱自己的儿子，想尽了各种办法去寻找儿子的墓地，以便把他的遗体运回家来，但是，她在没有找到墓地以前，就因悲伤过度而发疯了。

所有这一切，都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衣冠禽兽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关于铁托恐怖手段的受害者，兰科维奇在南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却说什么：“……在我国各族人民进行艰难而严酷的斗争的日子里，共产主义者联盟队伍内外有少数人，他们或者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为了自己的野心，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思想混乱和对我们的力量缺乏信心，在1948年参加了斯大林的反对独立和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从而犯下了背叛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最严重的罪行。”^① 这位哥里·奥托克地狱的创始人接着补充说：“那时没有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只是竭力防止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大家知道，有30 000多共产党员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而在1948年以后，却有200 000名左右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超过了当时全部党员的一半。这是不太重要的“少数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成千上万的人遭受监禁，无数的监狱、惨无人道、一连串冗长的拷问和侮辱——这都算不了什么！好像是在卡列梅格坦街上散步，或者像斗拳，结果不过是某个拳术家的脸稍微受伤，如此而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惯于玩弄字眼，他们不但在用塞尔维亚—克罗地文写东西的时候，意思与人不同，就是用世界上其他语文写东西，意思也是相反的，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引用了他们多次说的“民主”、“人道主义”和“教育措施”等话，然后我们列举了许多严酷的事实，来揭穿这些话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但是，那些在监狱中受尽折磨并且还在受难的人们的创伤、那些失去了自己至亲骨肉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的创伤、那些家破人亡的人们的创伤，是万分痛苦的，它们绝不是任何演说家的胡说八

^① 見《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126頁。

道所能治好的。

* * *

在結束這本小書時，我們不想說，所有題目都已經講到了，或者說，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分子的罪惡事迹已經終止了。我們在這本小書中所說的都是南斯拉夫流亡者告訴我們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1956年以前時期內所遭受的苦難。但是，事情到此並未結束。在我們面前還有無數材料和事實，證明監禁、拷問和槍決還沒有停止，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在繼續進行，因此，我們還要重新談到它們。

必須補充說一下，我國報刊不是第一次報道鐵托分子的罪行。我們的報紙用確凿的事實揭露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對科索夫、馬其頓和門的內哥羅等地的阿爾巴尼亞人所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過去南斯拉夫共產黨干部的悲劇和南斯拉夫勞動人民的悲劇的情況被揭露以後，科索夫人的悲劇現在就顯得更加突出了。它們是互相補充、互相襯托的。這幫匪徒，這群殺人犯，他們槍殺和摧殘無數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員，大量屠殺科索夫人的優秀兒子，並且折磨南斯拉夫人民。

阿爾巴尼亞人民對這幫罪犯、匪徒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究竟是一批什麼樣的人物非常了解，阿爾巴尼亞人民根據自己的親身遭遇，深知鐵托分子都是口是心非、進行惡意煽動和破壞活動的家伙，他們過去和現在都妄圖滅絕阿爾巴尼亞，並把它變成南斯拉夫的一個省。

鐵托及其同謀者的道路，就是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叛徒的道路。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具有光榮的歷史，它能識破各種各樣叛徒的面目。這些叛徒背叛了自己的黨和階級，他們反對共產黨人，對自己過去的同志進行卑鄙的誹謗，並且把他們出賣給帝國主義的劊子手。雖然如此，這些叛徒與鐵托分子還是有差別的；而且差別很大，這個差別在那裡呢？差別就在於鐵托分子這伙叛徒是在歷史上第一次掌握了國家即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國家，掌握了

可怕的警察机构，它被用来瘋狂地攻击一切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者，因为这些人不願踏上南斯拉夫統治者早已在走的叛变道路。

在他們的罪恶被揭露以后，他們就大喊大叫妄图证明不可能的事情，即想证明他們是“无辜的人”、“受到了沒有根据的責备”。当我們的报刊公布了科索夫 36 000名阿尔巴尼亚科索夫人爱国者被杀害的事实以后，铁托分子起初声明說，他們都是巴里斯特分子（即“巴里·科姆別达尔”卖国組織的成員），或者說，都是战犯。那末对过去的南斯拉夫共产党 1 000 多名党员的悲剧，他們又怎样解釋呢。

另一方面，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铁托分子支持战犯，并且利用他們来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他們把战犯当做自己的客人一样殷勤招待，然后就派遣他們到我国領土上来进行破坏和挑衅活动，从这本小书里我們已經看到铁托分子利用切特尼克和烏斯塔什分子的效劳，来折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和国际主义者。难道他們认为这些罪犯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是“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战士”嗎？对，这些人类的渣滓是拥护南斯拉夫特殊的社会主义的，而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希特勒分子的继承人馮·布倫坦諾等这帮人也支持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对匪徒和烏斯塔什分子这帮罪犯們來說，这有多么幸福：因为他們在铁托和兰科維奇領導下，竟有了这样的日子，能够成为屠杀和折磨共产党人的凶手，也就是繼續干着在德拉日·米哈依洛維奇和安特·巴韦利奇时代早就干过的一切活动。

我們在这本小书的前面談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在铁托监狱和集中营里的苦难的时候，曾經提到但丁的《地獄》篇里关于神的滑稽剧。如果偉大的斐阿倫支詩人的作品中写下了从他的幻想而生的悲剧，那末，我們在南斯拉夫所看見的却是現實的悲剧，是我們时代的最痛心的悲剧，是为社会主义流过血的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的悲剧，而他們的鮮血現在却正在遭到并且繼續遭到这帮叛徒和卖国贼的粗暴蹂躪和亵瀆。我們从这里也看到了千千万万人的

个人悲剧。

在这本小书里，我們曾提到許多名字，列举了一些被杀害或被折磨死的人的事件，提到了一些家庭悲剧。哪一事件最使人惊心动魄呢？是伊什特万·杜鮑什事件还是瑞基奇事件？他們两人都是被殘暴地折磨死的。是获得过許多勳章的那位备受卑鄙凌辱的老將軍久科·米腊舍維奇的遭遇呢？还是那位不幸的母亲、老女游击队员的命运？这位母亲的丈夫被枪杀了，她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她一从监狱里出来就发现她的幼女在道德上已經墮落了，为了一块面包而不得不从13岁起就出卖自己那未成年的肉体。哪一个家庭或个人的悲剧更使人惊心动魄呢？是那位母亲——她的曾經在山上同法西斯分子作过斗争的儿子出獄时竟当上了特务——的悲剧呢？还是那位剛从监狱出来就获悉自己的妻子在为国家保安局效劳的坚定的共产党员的悲剧呢？很难說，在所列举的悲剧中哪一个是沉痛的。分开来看，每个都是真正的悲剧，而整个來說，这又是南斯拉夫人民大悲剧的一部分。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和犯罪手段，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正是由于他們这种才干，由于他們处心积虑地消灭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它的最忠誠的干部，正是由于他們卖力地到处搞分裂活动（这是帝国主义最为需要的），华盛顿才对他们毫不吝惜美元。

铁托集团不仅毁灭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人民在自己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不遗余力地进行破坏活动，这就明显地表明它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些事实都是人所共知的。从布达佩斯的反工农政权的暴动起，到在近东反对刚刚从殖民主义政权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独立，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止，——在所有的地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都一贯充当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暗害分子的匪帮。近来，铁托的“理論家”爱德华·卡德尔在《战斗报》上以《社会主义和战争》为题发表了一連串文章，他在这些文章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攻击。这只不过

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旨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最感兴趣的——的又一次袭击而已。

为了便自己的破坏活动，南斯拉夫特洛伊木馬需要把自己肚子里所藏的东西伪装起来，否则它就变为无用之物。因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就竭力把自己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装扮成用自己那种特殊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来丰富馬克思主义的人。他們千方百計欺騙世界輿論，蒙蔽南斯拉夫人民的眼睛，使之看不見他們已經犯下和正在犯的，駭人听聞、令人发指的罪行；掩住南斯拉夫人民的耳朵，使之听不到从监狱和集中营傳来的呻吟的回声。

可是，事实終归是事实，不論是《战斗报》上的“理論文章”，还是那些冒充能够主宰世界命运的神明的人（而其实他們只不过是匪徒和劊子手罢了）的演讲，都掩盖不住这些事实。上面列举的事实再次說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它的“理論家”和“人道主义者”是怎么一回事。

封面
目录
正文